

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

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廿一次學術座談會發言紀要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臺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會議室舉行第廿一次學術座談會，討論「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座談會由本所主任吳俊才教授主持，出席參加者有（以簽名為序）：曹九中、郭乾輝、呂達、札奇斯欽、歐陽無畏、李天民、王健民、陳森文、朱少先、阿不都拉、蕭濟容、姚孟軒、朱文琳、呂律、蕭野暉、張鎮邦、崔垂言、馮達、吳俊才、胡秋原、劉粵生、彭思行、萬大鎰、汪學文、周鑫、孫震芳、李柏泉、沈國權等卅餘人，並承記者多人與會採訪，茲按當日發言先後，將要點刊載於后，以供讀者參考。

主席致詞

各位先生：今天是國際關係研究所第二十一一次學術座談會，很感謝各位在新春忙碌的期間，能抽出時間來參加。

今天我們所要討論的題目是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就最近一年整個大陸的局勢來看，我們提出這一個題目，相信各位一定也都能同意。

關於座談會的進行，我們想分成兩部份：先請幾位先生就當前的實際情況，根據第一手的資料，扼要提出報告，然後再請出席的各位先生指教。

張鎮邦先生：

共匪內部「造反奪權」鬥爭的新發展

毛林一派對劉鄧一派的「造反奪權」鬥爭，是做「一月革命」。但是直至一月廿二日，匪北平人本年一月從上海開始的，共匪把上海這一場鬥爭叫「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

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

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的社論，並且提出「一切權力歸革命造反派」之口號，作為在全匪區範圍內展開「造反奪權」鬥爭的信號。現在我們可以這篇社論看成是毛林一派向劉鄧一派所下的第一道總攻擊令，它標誌着擁毛派與反毛派的權力鬥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十分明顯，這場「造反奪權」鬥爭的結果，對於最後雙方誰勝誰負，是具有決定

性的。

毛林一派對劉鄧一派「造反奪權」，從一開始就居於優勢。這是因為：第一、毛匪今天在匪黨中的威望，有如當年俄國的史達林，而其在羣衆中被神化的程度，較史達林尤有過之，這就使得沒有人敢公開反對他，誰敢公開反對他，就會被視爲大逆不道；第二、匪黨的中央委員會，這些年來很少開過一次正式的會議，而毛匪目前仍然控制了匪黨中央政治局，這就使得他變成了匪黨中央委員會的化身，誰要是反對他，就等於反對匪黨中央；第三、經過這幾年與林匪彪的勾結，毛匪取得了匪軍的支持（雖然匪軍中也存在不少問題），在「文鬥」不能取勝的時候，可以改用「武鬥」取勝；第四、毛匪擁有由他一手創立起來的「紅衛兵」，這一支狂暴的力量，可以在「造反奪權」中擔任衝鋒陷陣的角色。反之，劉鄧一派則處於劣勢的地位。第一、他們不敢公開反毛，這就使得他們從一開始就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第二、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形式上雖然仍被保留在匪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之內，但是在實際上則是處於一種被軟禁的狀態，這就使得他們無法對分佈在大陸各地的追隨者進行統一的領導，以有效抵抗毛林一派的進攻；第三、劉鄧一派雖然掌握了地方權力，但是他們彼此之間不敢明目張胆地進行橫的聯繫，以免予擁毛派以口實，這就處于各自爲戰的不利地位。由於這種優劣形勢的不同，這就注定了劉鄧一派無法在這種「造反奪權」鬥爭中取勝。但是劉鄧一派幾乎囊括了大陸所有省（自治區）、市的權力，他們在地方上的羣衆基礎是很深厚的，從數量方面說，他們是多數，不是少數，這就必然使他們對毛林一派的進攻進行激烈的抵抗

。他們在鬥爭初期所使用的提高職工工資、增加福利補貼、鼓動工人「上京請願」，從而造成停水、停電、停交通，以及在農村年終分配中主張分光吃光的策略，爭取了廣大的工農羣衆，也着實予毛林一派以狠狠的一擊，以致直到今天，「擁毛派」還不停地喊着反對「經濟主義」的口號。可是畢竟是因爲形勢擺在那裏，他們始終是居於下風。雖然如此，毛林一派要想在這一場「造反奪權」鬥爭中獲得徹底的完全的勝利，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如上所述，當前共匪內部所進行的「造反奪權」鬥爭，就是毛林一派挾持其中央的權力來奪取劉鄧一派的地方黨政大權，而這種權力的奪取不是由上而下採取撤職和改組的方式，而是由下而上採取羣衆鬥爭的方式，這種情況，在中外歷史上可以說是很少見的。由於在緊要關頭毛林出動了公安鎮壓力量 and 匪軍，現在共匪已先後宣佈奪取了北平、上海、青島等市和山西、黑龍江、貴州、安徽、山東等省的權力。但是在一切奪得權力的地方，劉鄧一派的反抗仍然很激烈，他們所奪得的權力還是很不鞏固，而新的問題却隨着「造反奪權」的進行不斷出現，給毛林一派帶來極大的困擾。因此目前毛林一派是在總結前一個時期「造反奪權」的經驗，解決在「造反奪權」鬥爭中出現的新問題，準備把這一鬥爭進行到底。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把毛林一派所碰到的問題與所採取的策略和措施分四點來加以說明：

（一）消除「革命造反派」內部的分歧、鞏固「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共匪認爲，根據上海和山西等地的經驗，堅決實行「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是爭取「奪權」鬥爭勝利的重要條件。但是現在在

許多已經「奪權」的地方，「革命造反派」內部却出現了彼此爭權的現象，妨礙了「奪權」鬥爭的繼續進行，也妨礙了已經奪得的權力的鞏固。這就是思想行動上表現了「本位主義、小團體主義、分散主義、非組織觀點、極端民主化、自由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等等錯誤傾向，給劉鄧一派提供了分化利用的機會，使得「革命造反派」的大聯合趨於瓦解。爲此，共匪要求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活學活用毛匪著作，整頓思想、整頓隊伍，加強所謂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元月八日，共匪特地将毛匪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起草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重新發表，便是這個道理。但是「擁毛派」之所以參加「奪權」，其目的就是在「奪權」之後可以「做官當老爺」，那末在「奪權」之後就立刻互相排擠，互相攻擊，可以說是必然的。這個問題又那裏是共匪一個文件和一些號召所能解決？

（二）區分所謂資產階級當權派和無產階級當權派，對劉鄧一派實行分化和爭取。「擁毛派」在進行「造反奪權」之初，曾經產生把一切當權派都加以打倒的傾向，這在策略上自然是十分錯誤的。因爲這不但劉鄧一派更加團結起來，進行堅決的抵抗，也使一些本來不一定屬於劉鄧一派的當權派，也加入到劉鄧一派中去。後來毛林發現這種做法不對，便發出一種必須分清資產階級當權派和無產階級當權派的論調，同時要求爭取和聯合無產階級當權派，打擊資產階級當權派。「擁毛派」在山西的「造反奪權」鬥爭中把劉格平、劉貫一等五名高級匪幹拉過來，便是這一分化爭取策略的第一次運用；匪黨中

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匪任窮和匪黨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在黑龍江省的「造反奪權」鬥爭中公開站出來承認錯誤，則是山西經驗的進一步發展。顯然共匪是企圖以山西和黑龍江作為例子，來策動更多的地方高級匪幹向劉鄧倒戈的。

(二)建立臨時權力機構，鞏固和發揮已經奪得的權力。共匪認為，當前為劉鄧一派所盤據的地方政權，已經不是無產階級政權，而是資產階級政權，因此在「造反奪權」之後，必須把原來的政權組織形式打碎，建立臨時的權力機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再以這個臨時權力機構為基礎，進一步建立新的政權組織形式。而這種臨時的權力機構，依照黑龍江省的經驗，是應該由「革命造反羣眾組織」的代表、匪當地駐軍代表和黨政機關「革命領導幹部」三結合為核心組成的。至於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構的新組織形式，則應該依照巴黎公社的圖式，根據實施全面選舉的原則加以組成。為此，共匪在二月二日成立了「北京人民公社籌備委員會」，二月五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以代替過去的「人民委員會」，為未來建立新的國家組織形式鋪路。大家知道，毛匪在一九五八年發起人民公社運動的時候，曾經一度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後來因為農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已困難重重，而城市的情況更加複雜，那才加以放棄。現在他在「造反奪權」鬥爭中又重新把「城市公社」這個概念提出來，這就可見他醉心於發展馬列主義是到了多麼可笑的程度。

(四)加強鎮壓「反毛派」，防止「反毛派」的反攻。「擁毛派」在奪得權力之後，為了防止「反毛派」的反攻，現在正採取各種措施，對「反毛派

」加強鎮壓。依照「擁毛派」的分析，目前「反毛派」的活動方式，是多式多樣的。第一、是以「革命造反」的姿態出現，進行假奪權或反奪權；第二、是利用「革命造反派」的內部矛盾，混淆是非，挑撥離間，製造分裂；第三、是「裝死躺下，消極怠工，待機反撲，因此「擁毛派」認為必須對他們提高警惕，實行「專政」。例如貴州「擁毛派」在「奪權」後所發佈的通令中，對所謂「當權派」就提出應該區別情況，採取一抓、二罷、三提、四留、五調的方針，並且強調必須把罪大惡極份子和死頑固份子抓起來。

總之，當前毛林一派對劉鄧一派所進行的「造

蕭濟容先生：

工礦、財貿界的反共反毛鬥爭

一、總情況：從去年秋季開始，毛林為主之「文化大革命」在中共政權各個經濟機構展開，其目標僅在少數所謂當權派，推動力量為擁毛份子

，結果並不圓滿。根據半年來各省材料，經濟事業及企業——尤其工礦、財貿界「文化革命」其所以推動較遲，是由于反毛之當權派，以趕生產為手段而阻撓；其後，毛派開始所謂由下而上之奪權鬥爭，反毛派遂一面推出工人及赤衛隊北上「告狀」，一面與擁毛之紅衛兵奪權鬥爭，和反奪權鬥爭，因此發生了交通癱瘓問題；經濟主義危害問題；武鬥流血問題；以及生產停頓、市場紊亂等問題；這是

反奪權」鬥爭是十分激烈的，也是十分複雜的。劉鄧一派所代表的，是匪黨黨內的反毛勢力，事實證明，這一股勢力是十分強大的。劉鄧一派在主觀上自然並不反共，但是在當前大陸具體的條件下，它在客觀上却又是大陸廣大人民反共思想意識和反共情緒間接的反映。因此，不管這一場鬥爭表面上的結果如何，劉鄧一派的反毛勢力仍將繼續在大陸上的每一個角落潛滋暗長，而且大勢所趨，最後必然與大陸上廣大的反共力量相結合，從而形成一個洶湧澎湃的反毛反共的羣眾革命運動，猛烈衝擊和徹底摧毀匪偽政權。

根據擁毛派和新華社等官方之材料報告，及來自各省(區)市之大字報。

以所謂當權派而言，上述事實之演變責任或真實性並不絕對客觀。從匪文化大革命之始到現階段，反毛派大小幹部並未公然叫出「反毛」，即以「上北京告狀」來說，也是「向黨中央」及毛匪告狀或「反應」情況，故「當權派」也者自始未曾公然反毛；及至「紅衛兵」由下而上奪權所發生的鬥爭，其對經濟機構，主要的生產企業之業務有影響是必然的，然如無「羣眾」介入，也不會太嚴重。但羣眾如何介入並形成對經濟的嚴重影響呢？「紅衛

兵」上有共黨中央與武裝軍隊支持，下有數千萬擁毛隊伍（僅紅衛兵即達二、二〇〇萬人）並擁有匪黨中央及毛匪為後盾的有力武器，而敵不過「羣衆」力量，如果說不敢公然反毛之各地區當權派有此力量，似乎把當權派估計過高，道理很簡單，這些羣衆，包括絕大部份的生產工人及若干共幹開始了反毛反共的實際行動，而這一反毛反共怒火，誠然為「紅衛兵」所燃起，因起抑低了紅衛兵聲勢，此在奪權鬥爭中，適成了當權派的偶然助力，這是毛匪始料所不及的。

反共怒火燃遍大陸各省（區）市，當權派又成了代罪羔羊，而當權派爲了生與死的問題，又偶然得以適時地利用反共反毛羣衆中的一部，是以形成了近三個月來毛派奪權中之白熱化，與雙方僵持或權力轉化局面。至現階段，除寧夏、雲南、陝西三省區僅有零星材料，難作全面分析外，其他之廿一個省（區）及上海市都發生大規模地、普遍的反共反毛革命運動，此種反共反毛革命運動尙繼續擴展中。如果以擁毛及反毛兩派而論，黑龍江、山西、貴州三省奪權較成功，但生產迄未恢復正常；河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廣東、四川、福建、內蒙、新疆、遼寧、山東、湖南等十三省區，不僅擁毛派未能奪權成功，或雖已奪權（如鄂、贛、魯、浙）而不能命令下達，即反毛派之劉鄧系當權派也未能完全控制，上述各省可說在羣衆自發性反共反毛革命運動的狂熱紛亂中。

二、交通停頓、市場紊亂、物資供應緊

張、財政膨脹：在去年十二月到本年元月初，滬杭、滬寧、浙贛鐵路「基本」停開，至元月中旬

始恢復行駛；二月初旅大鐵路完全停頓；在早期（去年十一月到本年元月），航運及港口，因工人罷工大多數業務停頓，故若干港口如上海、武漢、青島、重慶、天津外貿物資堆積，影響匪外貿合約之履行。各地物資交流不暢，城鄉交通阻滯，形成城鄉生產及生活資料之供應緊張。加以當權派在反共工人壓力下增發和補發了若干待遇（此即所謂經濟主義事件之一）——當權派也以此利用工人反共情緒與要求，一時套購、搶購物資，市場於焉紊亂，物價上漲。在提款浪潮中，當權派也曲從「羣衆」要求將儲蓄存款解凍，加上增發、補工資，和「革命造反」之兩派費用之支出，一時使偽銀行發生擠兌，偽幣幣值下跌，金融市場混亂。

以具體例證而言，工人所得之補發、加發工資，最多者爲一、〇二七元（僞人民幣以下同），如上海航運部航測隊工人；最少一百幾十元，如上海鼓風機廠工人。以所謂革命造反串連費言，每一工人造反串連費最多者二〇〇元，如杭州棉紡織印染廠；最少者也有九〇——一〇〇元，如江西日報印刷廠工人。以造反團體經費或北上告狀費用而言，最多者上海港務局九個裝卸區一四〇萬多元（幾天內發出）；武漢工農辦事處卅多萬元；上海捲烟廠數十萬元；最少的也有一萬元，如江西日報印刷廠。按各省市有職工近二、〇〇〇萬人；造反單位（擁毛及反毛組織）未曾詳計，以上海市言大小團體達數百個，中等城市如南昌、福州也有百個以上。故以上三大支出：即工人之增發補發工資；造反串連費；造反團體支出及告狀經費至少爲四〇——五〇億元左右。此四〇——五〇億元中，絕大部份是在羣衆壓力下增加的支出。再以「紅衛兵」費用而言

：廣西「紅衛兵」每人每月爲七元，此外尙有支票可在外串目標地銀行兌現；江西紅衛兵每人每月十二——十五元；也有高達廿元以上的（每人每月），如廣州地區。紅衛兵人數據可靠材料共有二、二〇〇萬人，如每人每月以十五元計算（交通費用除外），每月爲三三、〇〇〇萬元，一年爲三九點六億元。赤衛隊員無完整統計，僅據滬、漢、穗、青等地估計亦在百萬以上，全部當在數百萬人；農村因大部生產隊分光公益金、公共積累，並提光儲蓄存款，僅農村多提取之現金超過六〇——七〇億元，（按一九六四年農村儲蓄存款卅多億元及典型地區生產隊公益金、公共積累而估算）城市儲蓄存款以一半提存計算——十多億元，共計紅衛兵支出與城鄉現金之提出者一年來超過一二〇億元。總計「文化革命」以來財政部份多支出九〇——一〇〇億元；銀行現金多支出七〇——一八〇億元左右。在物資消耗中，最多的爲紙張與布疋，此爲宣傳爭鬥中之擴耗，相對地增加了若干必需品的供應緊張。

三、生產萎縮，停工與罷工爲反共反毛

總的表現：工人普遍脫離生產和罷工，造成工廠及商店的停工、停產，和生產任務之不能完成。由于罷工、怠工與工人離產多而未能完成生產之企業，有報導者如青島機車廠本年元月生產計劃僅完成三分之一；合肥軸承廠僅完成生產任務百分之三；重慶紅岩機器廠僅完成生產計劃（一九六六年）百分之八十三；濟南第一機床廠完成計劃任務一半左右；上海港務局裝卸區完成平常吞吐量三分之一；上海照相機廠（本年元月份）完成生產計劃百分之廿左右；此外共匪承認生產下降，未說明下降幅度者

有天津麻紡織廠，鄭州國棉五廠等。

若干企業工人脫離生產生產停頓，和部份停頓嚴重影響生產者，商業部門有上海、杭州、武漢、青島之百貨、土產等公司。工業部門，有武漢鋼鐵公司、上海鋼管廠、武漢重型機器廠、武漢中原機械廠、合肥起重機械廠、上海玻璃機械廠、合肥開關廠、成都配件廠，天津無縫鋼管廠、江西農藥廠、陝西第一毛紡廠、毛西棉紡織印染廠等數十個單位。

職工脫產人數，和各該企業職工總人數比較，為百分之廿二（如合肥開關廠）至百分之百（合肥起重機械廠）。部份脫離生產，在時間上持續長達數月，至今仍未完全恢復生產者，如上海玻璃機械廠，脫產工人達百分之六十二點五。在若干企業中，不少工人在黨政軍壓力下仍不願生產者，亦為極普遍現象，如重慶探礦機械廠，有職工六〇〇人，擁毛之骨幹生產工人僅五十三名；哈爾濱石油機械配件廠二七〇名工人中，有一〇〇名公開反毛。（但並非擁護）。不僅一般工商企業之職工如此，即中共軍部之後勤工廠（北平）亦有不少工人脫離生產崗位從事反毛活動。

工商企業工人罷工，脫離生產從事反毛反共之革命活動，一部份藉劉鄧系之所謂當權派掩護外，大多數為獨立作戰之自發性且缺少組織領導之反共鬥爭。一部份則雖然表面擁毛，仍然提出條件，要求毛共予以解決，因此形成對於毛共之威脅。如哈爾濱石油機械配件廠「八二五」戰鬥隊（擁毛組織）之一七〇名成員中，有五〇人要求解決兩年的補助工資問題。在福州，「革命羣衆大字報」材料，該市工人，無論是反毛或擁毛派，大多要求補發一

九五三年工資改革時被扣留的部份工資。他們的總論是：「我們對重大政治問題看法有分歧，但對經濟我們利益是一致的」。

毛共說這些事實之造成歸罪於「當權派」經濟主義，而毛派內部工人也要求經濟利益又作何解呢？況且脫離生產（離開生產崗位）和罷工（在企業內而狗倒不幹活）的職工並不完全是要求經濟利益，他們（她們）就是爲了反共反毛，經濟要求不過是反共反毛的理由和藉口之一。

四、結論——反共反毛已將發展爲有組織的流血革命行動：

根據上海市本年一月底二月初情形（二月九日上海解放日報）若干反共職工，與當地社會之反共人士結合，衝進市場管理所搗毀檔案，並開大會，鬥爭親毛幹部，毆打市場管理所工作人員；江西省到處發生圍攻工商管理機構，綁架和毆打工商管理幹部和市場管理員，使上述人員不能正常進行工作

。（本年二月九日江西電台廣播）。上海和江西爲毛派宣佈已奪權地區，在二月上旬的情形仍然如此混亂，其他如鄭州、開封、武漢、廣州、福州等毛派勢力較薄弱地區，經常流血武鬥就毫不奇怪了。據劉少奇、鄧小平等於本月初在北平坦白，他們承認「革命」路線是有錯誤的，但沒有反毛；各地區大小共幹，最多也只爲了衛權，或唆使工人「北上告狀」——向毛、及「黨中央」，更談不上反毛，敢反毛的是久處共匪迫害下的廣大「羣衆」，他（她）們不僅反毛，也同時反共，此一逼及大陸各省，廣及城鄉的反共狂潮，在目前毛共之「大聯合」、「三結合」中更突出的暴露出來。現階段，由于共幹及職工之反共革命行動與社會廣大反共力量之結合，或趨於結合，在形式上已由自發性的渙散個體行爲，漸發展爲組織性的有機體，勿庸懷疑，此將導引農村反共力量成長而更加速的埋葬共匪政權。

蕭野暉先生：

工農羣衆的反共反毛鬥爭

隨着新年的來臨，匪黨內部的權力鬥爭，出現了一個舉世矚目的新情勢，這個新情勢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劉系勢力在全匪區內掀起一個強烈的「經濟主義」的大風暴，這個大風暴來勢急驟，威力甚猛，它首先震撼了匪區的經濟中心上海市，並迅速地席捲了全大陸，從而使匪區社會及其財政、經濟領域，陷入一個混戰的局面；使毛林集團陷於空前

的孤立。促使匪黨內部的鬥爭，走上更加深廣、更加尖銳的奪權與反奪權的新階段。而大陸廣大的工農羣衆亦乘機而起，掀起了反共反毛鬥爭的新高潮。

大陸廣大工農羣衆反共反毛的鬥爭，十八年來一直是呈現着一種波浪起伏、後浪推前浪的狀態，它像一大片根深蒂固、蔓延叢生的野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十八年來前仆後繼的鬥爭

事實表明，每當共產匪發生內潰危機，控制力削弱的時候，大陸工農羣衆的反共抗暴鬥爭就有一次的新高潮，此次大陸工農羣衆就是利用匪黨內部的權力鬥爭，劇烈互相傾軋，控制力薄弱的時際，而乘機叢起，更由於當前劉鄧集團運用「經濟主義」的手段，借工農羣衆之氣勢以反毛，大陸廣大工農羣衆亦乃因勢利便，再一次全面地展開了反共反毛的鬥爭。此次反共反毛鬥爭的主要特點，是鬥爭的靈活性和多樣性，是目標的明確和行動的一致而尖銳。

工人方面

第一、工人方面：它首先在上海市點燃起鬥爭的烽火，繼而南京、杭州、福州、廣州、南寧、天津、濟南、太原、蘭州、鄭州、武漢、南昌、西安、成都、重慶、貴陽、青島、瀋陽、長春、哈爾濱、迪化、拉薩以及大慶油田、焦作、平頂山諸煤礦和武漢鋼鐵公司等大中城市和工礦區、港埠碼頭、水陸交通運輸系統的廣大工人，起而響應，迅速形成一股不可抑止的反共鬥爭的洪流，其鬥爭的方式，歸納起來有下列四項：

一、是以組織對組織：當毛匪驅策「紅衛兵」到工礦企業串連，發動「鬧革命、造反」的時候，各地廠礦職工即紛紛組織「工人赤衛隊」、「工人糾察隊」、「紅聯軍」等，與「紅衛兵」相對抗，並先「抓生產」為號召來反抗「紅衛兵」的「抓革命」。以「保衛生產」為名來壓制「紅衛兵」的造反。使各地廠礦陷入混亂的狀態。

二、是以經濟鬥爭對抗政治鬥爭：利用毛劉兩集團的矛盾，抓住劉系運用經濟利益的刺激，發動工人反毛係造反的機會，普遍要求增加工資、增加、

福利、增加夜班津貼、加發烤火費，老二級工人要求升級，青年學員要求補發工資，徒工要求提高待遇，發動強烈的經濟鬥爭，轉移毛共政治鬥爭的大方向。

三、以積極的姿態出現，以進行「革命串連」為名，舉行大規模的罷工：利用廠礦劉系當權派企圖打退毛系「紅衛兵」造他們的反，鼓勵工人離開生產崗位的機會，將計就計，紛紛請領串連經費及船票、車票等，以「赤衛隊」、「糾察隊」為主導，紛紛離開工廠，外出串連。使廠礦生產陷於停頓。例如成都配件廠，全廠工人一下子走三分之二，第一道生產關口——黑色鑄造車間，人員則走了一半，車間主任等生產幹部全部走光，他們並帶走了生產工具，移動了機床位置，甚至在潤滑油中滲進渣子，迫使機器不能開動，生產癱瘓。此外，如上海玻璃機械廠、重慶紅岩機器廠、大慶油田等各地企業都有類似的情形，就整個城市言，如上海等城市則由於工人發動全面性的罷工，非但工廠停工、商店停業，鐵路、公路、航運亦告中斷，港埠碼頭癱瘓，市內停水、停電、停交通，使整個城市陷於窒息的狀態。

四、利用合法鬥爭，推卸責任：利用劉系把持的偽「全國總工會」在去年底及今年一月發給各地工廠的電報，發動職工及幹部赴平的機會，把破壞生產的責任，往所謂「革命造反派」的頭上推，「向革命造反派倒打一耙」，指「革命造反派為權利造反」，於是各城市工人，以「向上述心」「上京告狀」為名，堂而皇之大批湧入北平，造成毛共政治中心的大混亂。最近，反毛派利用中國民間傳統生

業中，假借「照顧職工」的名義，任意批准職工假期，用補假、休假，增加工資，提前發薪，提前放假，延長假期，回鄉探親等手段收買羣衆，各地工人亦樂得悠悠哉遊哉，打回老鄉去，又使廠礦企業的生產，蒙受極大的損失。

農民方面

第二、農民方面，他們對匪的鬥爭更為劇烈，概括起來，亦有下列四方面：

一、提倡「三光」政策，破壞公社分配制度：當共匪人民公社進行年終分配的時候，普遍提倡「分光、吃光、用光」的「三光」政策，例如北平郊區各縣農民「提倡有錢分錢、有糧分糧、有物分物，甚至把今年的種籽和飼料以及今年的生產資金都分光」。把應向匪偽交納的公糧，應該還也可能還的貸款、定金，以及應該交的機耕費、水電費等，都不交或者少交，不還或者少還；強調多吃多分「少留甚至完全不留公積金和生產資金」，破壞公社分配制度。

二、分掉集體經濟的老本，挖空集體經濟的積累：提出必須「關心羣衆生活」的口號，「大量私分生產大隊和生產的公積金、公益金和集體儲備糧」，「有的甚至把人民公社化初期提存的，後來已經轉為積累的為數不少的一筆錢分掉，分了這種集累還不够，又加上了幾年的利息，一起分掉」。有的地方「他們明目張胆地拆社會主義的台，分掉集體經濟的老本，把高級社時期的股份基金、國家建設佔地發給的佔地款和變賣財產的錢統統分掉」，黑龍江各地甚至「變賣生產工具和耕畜，把生產隊的所有現金和實物分光分淨」。挖社會主義的牆腳

，破壞集體所有的制度」。

三、「造超產征購的反」，反對共匪的價差剝削：據一月二十日浙江毛系造反派發出緊急通告供稱農民「他們叫喊『造超產征購的反』，或者無理要求國家以高價來收購超產糧，拒絕國家對超產糧的征購，破壞國家征購任務的完成」。又如湖北黃岡及各地的農民，更公開的說「搞文化革命是大民主，我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國家糧食征購任務，完不成，不要緊，上面要催，就造他們的『反』，吃多少，算多少，不夠就造反啦！」向發禾公社第六大隊的一個生產隊，亦就因為這樣而開支亂補助糧兩萬四千多斤。

四、報仇洩恨，破壞共匪對市場的統制：如安徽省長豐等縣的農民「跑到城市裏把四清工作隊員揪回去鬥爭，……打人行兇，放哨監視，限制工作隊員的自由，剝奪他們通信、看報的自由，甚至不准四清工作人員互相說話，不准他們休息，剝奪他們的飯食……在四清運動中受到處分的基層幹部，也公開揚言要四清工作隊把他們的材料燒燬」，翻案平反。他如福州、江西各地堅決反共被共匪稱為「四類份子」的人士，利用劉系反毛當權派的意圖，「從各方面搗亂市場、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的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名，到處洩私忿、圖報復，公然威脅、毆打、綁架工商管理工人人員，企圖強奪過去處理案件的所謂黑材料，進行翻案」。有的進行投機倒把，棄農從商，大肆搗亂共匪統銷、收購物資，破壞社會主義市場。

從當前大陸工農羣眾如火如荼進行反共反毛鬥爭的情況觀察，可得出兩個值得重視的要點：

第一、由於大陸工農羣眾的反共反毛的鬥爭，

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

均直接影響共匪工農業的生產，在其整個財經領域中，已呈現一片混亂，共匪在「大躍進」中遭受嚴重斷傷的經濟，經過五年調整後所露出的一點生機，又重遭摧毀，而面臨更加糜爛的命運。

第二、此次大陸工農羣眾的反共鬥爭，利用、結合反毛派推行「經濟主義」而進行，工農羣眾根

阿不都拉先生：

新疆地區的反共反毛鬥爭

在大陸各地的反毛大門爭中，新疆地區表現得最突出、最激烈、也最重要。

關於匪維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兼新疆軍區司令員王匪恩茂擁護反毛的事，傳聞的最早。南斯拉夫「政治家日報」的駐平記者，曾發出劉鄧集團，着王恩茂派兵一師，赴平「勤王」的專欄報導。對於這項派兵「勤王」的報導，我們持懷疑的態度，因為：

- 一、新疆遠處西陲，離北平太遠，長途運兵，需時費力，太不經濟；
 - 二、長程轉輸，無法保密，自然會受到親毛部隊的截擊，而誤了大事。
 - 三、新俄、新印邊境，戰備緊張，新疆境內也不斷發生反抗暴事件，抽調兵力，不無困難。
- 但是，對王恩茂及其所屬擁護反毛一節，我們并無意外之感，理由是：

一、在人事背景方面：新疆地區的匪偽黨政軍幹部多出自一野，與彭德懷和賀龍的關係太深，對

深蒂固的私有觀念，得到進一步的昂揚，正如共匪上海文匯社論的描述，廣大人民對「什麼政治掛帥，什麼共產主義，統統不要了；什麼國家利益，什麼長遠利益，一概置諸腦後了。」這就再一次的說明共產主義絕不能在中國大陸植根，毛澤東思想的符咒，並不能發生什麼效驗。

毛匪罷黜彭德懷和毛匪的三面紅旗政策，大為不滿。此點，可以從新疆軍區副司令員郭鵬「對零零二四部隊二支隊幹部情況的調查」報告中看出。郭鵬說，該支隊幹部政治立場上的大是大非，存在着一些問題，比較突出的是，有「少數人」對黨的領導和三面紅旗的態度有問題。

二、在黨政組織方面：劉鄧集團已掌握了新疆的黨政組織。我們應該注意到一項事實，即是王恩茂集黨軍權於一身。舉凡省區首長，集黨政或黨軍權於一人之省份，多是反毛最激烈的地區。原因是黨組織長期在劉鄧控制之下的緣故。此外，還有一點特殊情况，是新疆第一副主席武光的個人因素。武光是劉少奇的親信幹部。抗戰前在劉少奇的領導下，在北平從事學運和工運。他曾以洋車夫作掩護，打入工人羣眾——編印「青工之友」小報，民國十九年，曾領導羣眾，砸過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民國二十年，擾亂邁艾迪博士的演講會，還怒打「萬人敵」電影的演出。劉少奇爲了加強對新疆黨政

組織的控制，把武光從航空學院調到新疆任黨委會書記，兼新疆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近年來，他是王恩茂以下的第一個紅人，在新疆的黨政組織中，自然會發生有利於劉鄩的影響。此外，新疆黨政組織中，少數民族的高級幹部，如主席賽福鼎、副主席賈買提明·伊敏諾夫、帕提汗蘇古巴也夫、艾斯海提、祕書長扎克洛夫、匪黨維吾自治區委員會文敎部部長安尼瓦爾汗巴巴、農村工作部部長司馬益牙生諾夫、組織部副部長馬木托夫等無一不與蘇俄有深厚關係。在共匪反地方民族主義、反修正主義的鬥爭下，這些人長久被困，不敢動彈，一旦機會來臨，必然會與風作浪，擴大爭端。當然，我們不能硬性的指他們親毛抑或親劉，不過從利害與思想路線上，應該和劉鄩集團比較接近。

三、在地區情勢方面：新疆是一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民情複雜，生活習慣與內地迥異，伊斯蘭教在人民的生活與思想中，根深葉茂，不能動搖；新疆是共匪的國防最前線，蘇俄和印度的大軍壓境，待機興黨，新疆內部的任何大動亂，均有可能引起外患的入侵；新疆是個反共抗暴最劇烈的地區，共匪統制大陸十七年來，新疆內部反共抗暴運動，民族分離活動，不絕如縷，是匪偽統治的一根盲腸。在如此的情勢下，作為一個「封疆大吏」的王恩茂，無論在「國家」與個人的利害上，均不願地方發生巨變大亂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何況毛匪的「文化大革命」，對新疆來說，更不相宜。一定要實施它，必然會鬧出大禍來的。

有關新疆反毛鬥爭的報導很多，但是語焉不詳，仍然沒有辦法獲得深入和全面的瞭解。綜合各方面的情况，可清理出下面的幾條線索：

一、新疆共匪的奪權鬥爭的跡象

(一)反毛派的勢力根深蒂固：自從共匪倡導「文化大革命」以來，新疆地區的反應非常冷落，有關文革活動的新聞，也非常少。在迪化（烏魯木齊）成立什麼紅色造反司令部、紅衛兵司令部時，地方的黨政首長，祇有那個吐魯番的老農，共匪培植起來的第七副主席鐵木爾·達瓦買提，和這些造反團體公開的碰過一次頭。這樣說明新疆的匪偽黨、政組織和軍隊，並不支持毛匪的文化革命。所以支持毛匪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機關造反團」，指斥新疆的黨委頑固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非偶然。新疆黨委的反毛政策，得到新疆各族人民與各業各界的普遍擁護。這一點，也可以從匪方的新聞資料中看出。例如（一）當內地各省市舉行什麼誓師大會，向反毛派發動總攻；各地駐軍示威遊行，「支持左派粉碎反動派的反撲」等等的時候，新疆毫無動靜。（二）匪新華社報導新疆某些工廠學校機關會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矇蔽的工人、學生和幹部，在讀到「告上海人民書」後，覺悟過來。足見反毛份子，也深植在基層。（三）擁毛派自承，阻力重重，必須獲得解放軍的支持，才能在這場大決戰中獲得勝利。

(二)擁毛派的奪權已經失敗：自從匪通告「告上海人民書」後，新疆石河子地區的工礦企業單位內的一些親毛份子便準備展開新疆的「奪權鬥爭」。一月二十四日，匪新華社公佈了元月十二日夜，太原擁毛派奪權勝利的經過。新疆的擁毛派也受到鼓舞，便籌劃奪權的行動。他們的辦法是把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學校運動相結合，形成一支擁

毛的大軍，內外聯合，兩面夾攻，要從當權的頑固的黨委手中，奪過權來。於是便造成石河子地區反毛派與擁毛派的武裝的流血鬥爭，據大字報消息，在石河子集中的反毛退役軍人在一萬以上。據來自北平的消息，在匪軍的鎮壓下，反毛武裝被迫退入山區。反毛的武裝鬥爭，暫告平息。不過從元月三十日起，共匪的地方廣播中，沒有半條新疆的消息，這可能是新疆情況，仍在混亂的跡象中。

二、新疆奪權鬥爭的內幕：新疆反毛鬥爭，決不是孤立的，雖然王恩茂有他不得不反毛的內在原因。我們相信王恩茂的老上司，也是新疆多數軍政匪幹的老上司賀龍、王震等，對他們發生一定的影響。由於賀龍、王震以及張仲瀚（曾任第二軍第五師師長，生產建設兵團副政委及副司令員，現任農墾部副部長）等等遭受整肅，益證實這項判斷無誤。由此，我們再擴大看賀龍系的勢力範圍，內蒙、陝、甘及四川也展開激烈的反毛行動，這樣說來，他們事前會獲得某種協商，非不可能。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民族在這場大門爭中，尚無積極行動，雖然賽福鼎有被逮捕的傳說。此外，反毛派尚無與蘇俄有聯繫的跡象。不過蘇俄除在新俄邊境增兵外，並不斷發生邊境衝突。蘇俄雖宣稱不直接介入共匪的內爭，但這也說明可以間接介入這場內爭。間接介入的方法很多，除了予當地的反毛派以支援外，還可以訓練、裝備由新逃俄的各族人民，返回新疆，進行奪權活動，這樣一來，問題便簡單了。

三、毛林的對策：對新疆反毛派的處理，毛鱗非常慎重，雖然北平的若干大字報，也攻擊過

王匪恩茂，但是比較起來，還不算嚴重。從各種資料中顯示，毛、林正用左列方式消除新疆的反抗：

(一)用反俄來轉移新疆軍民的視線。

(二)用保全國家領土的口號來分化約束與團結反毛人士。這個藥方很靈，辛亥革命時楊增新用過它，大陸陷匪時，陶峙岳所以能使十萬國軍放下武器，也是乞靈於它。

(三)軍事鎮壓，目前集結新疆的匪軍番號、數量，我不詳知，但是有幾點值得注意者，王恩茂之舊屬，多解甲歸田，編成生產建設兵團。担任國防守備的部隊，可能是林彪系的五十四軍。這可能是王恩茂，未能立即揭竿「起義」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分化脅迫，共匪拘捕賀龍、王震等（又云王恩茂已在北平失去自由）匪酋，藉以對新疆反毛匪軍進行說服分化。

新疆反毛鬥爭之發展如何？是一件值得重視的問題，其原因不僅新疆是共匪的原子試驗基地，它

出產世界產量最多的鈾礦；最重要的，還是它所處的戰略地位。自古以來，邊患常導致內亂，內亂也導致邊患。邊患內亂之齊來，將是一個王朝興衰更迭的關鍵。毛匪以暴力奪取政權，以狂虐統治人民，法統不正，基礎脆弱，今又內信暴亂，外挑邊釁，他垮台條件已完全形成。目前，最要緊的是，如何擴大新疆的反毛行動，如何將融合新疆的民族矛盾，團結海內外的新疆各族人民，在三民主義的大纛下，向毛匪宣戰，向新疆進軍。這將是決定新疆反共前途的一項決定因素，重要課題。由於這些問題，不是今天討論的範圍，不擬細說。以上是個人根據有限資料，所申述的一點意見，請各位指教！

謝絕各位。

札奇斯欽先生：

內蒙古地區反共反毛鬥爭

自從毛、林兩匪的集團以「文化大革命」為標題，發動「紅衛兵」到處「造反」，來整肅那些以劉、鄧為首的，所謂當權派的異己份子之後，在大陸上造成一片混亂，因而引起反共反毛的活動，如火燎原一般普遍的燃燒起來，當然在這種大動亂中，內蒙古地區並未因它的特殊性而免掉波及。

我們從報紙上看到在這幾個月內，一連串被「紅衛兵」指責或鬥爭的，有偽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李實，偽內蒙大學前代理副校長楊涵章，偽內蒙大學

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

副校長于北辰，偽內蒙古自治區檢察長張如崗等十幾個人。同時也說到偽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的「主席」烏蘭夫也受到批評。

在以上這些被紅衛兵所攻擊的人當中，李匪實、楊匪涵章等一部份人所犯的罪名除一般性者外，還有反對毛匪關於民族問題理論的，民族分裂主義者的一條重罪。但從這些人的姓名來看，除僅受到批評的匪烏蘭夫之外，似乎沒有一個是蒙古人。但是不能因此就說這是蒙古人民反共反毛的一個反證。

這一個問題到了上月末，突然很明顯的證明了在這一區域之內的蒙古人，反毛活動更是積極。二月二十七日台北各報紙都刊載了：「內蒙出生的中共「副總理」烏蘭夫，由於高喊「蒙古應該歸蒙古人統治」的口號，顯然已經率領他在內蒙的武裝部隊，反對中共「主席」毛澤東」的消息。但是在以後我們還沒有看到更進一步的消息。

內蒙古這一個地區，在整個大陸反共反毛的鬥爭中，另有它的特殊性。這就是它的民族問題。共匪在叛亂時期，就用以民族主義為糖衣，以共產主義為內容的伎倆，騙哄了蒙古和其他各少數民族。然後用自治的外形，達成其消滅各民族存在的陰惡目的。但是也就因此，使那些受了騙的蒙、維、藏等民族，開始醒悟，為了生存自然而然的非走入反共反毛的途徑不可。

中共匪幫也不是不瞭解這一個事實的存在，所以在他們有關內蒙的各種宣傳上，總是愛用「團結各族、各界」，「蒙古民族當家作主」，和「保障蒙古民族的地位、權利」的口號。但是事實上他們所行的，却和他們所說的全不一致。他們的詭計，早被「蒙古人民雪亮的眼睛」給看穿了。

在共匪於內蒙古成立了「自治區人民政府」的前幾年，不斷的高揭「自由放牧、增畜保畜，「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禁止開荒、保護牧場」等等的口號。後來這些口號都證實了共匪是口是心非的騙子手。他們所行的都是與他們所說的正相反。而且在所謂「文化大革命」的「造反」中，他們自己更把這些假口號給揭穿了。

共匪最初也會提出不許「狹隘地方民族主義」，與「大民族主義」的存在，並詆譭我政府是「大

漢族主義者」。可是他們只對所謂「地方民族主義者」，也就是各族中真正的民族主義者開刀。他們自己却是「大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真正的實行者。在外蒙共產政權成立之後，年年都有反共的民衆逃亡至內蒙；現在正是相反，年年有大量的內蒙民衆逃亡到外蒙去了。他們都是由於共匪的逼迫才離開了故鄉亡命的。這種情形今天在新疆各族之中，也是如此。前三年就有一個逃到外蒙去的內蒙學人曾透過外蒙和蘇俄的廣播，公開指摘共匪是沙文主義者。

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前述李、楊等匪的被鬥，還特意給他加上違反毛匪民族主義理論的罪名。自然是說他們爲大民族主義者，違反其他少數民族利益和團結的罪人。其目的不外紅衛兵的造反中，要引起蒙古人方面的同情和支持而已。

至於烏蘭夫個人，曾在民國十四、五年間，去蘇俄留學，在那裏加入國際共產黨，回國後才加入匪黨的。他是共匪蒙古政策的執行人，也因他是蒙古人而爲共匪標榜少數民族政策的一塊牌匾。在抗戰勝利，共匪叛亂，直到現在的這二十多年之間，他總是忠實的爲共匪作伥，盡量的以「地方民族主義者」，或「民族分裂主義者」的罪名，把蒙古的「真正民族主義者」，和走蘇俄、外蒙路線的「國際主義者」，一一的從一切偽組織中排擠出去，予以整肅。而今天他在毛匪的眼中，也成了必須要剷除的一個異己份子。這也證明了所謂「血濃於水」的格言，以共產主義或毛澤東思想要代替民族主義，終是不可能的事。而烏蘭夫事件不過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而已。

我們也可以這樣看。毛澤東既然以反蘇俄爲號

召，利用民族主義反抗所謂走修正主義路線的劉、鄧。那麼這個被毛匪排擠，可能也要遭到清算的烏蘭夫，自然也會反過頭來，走所謂「狹隘地方民族主義」的「反動路線」，打起「蒙古是蒙古人的蒙古」之旗幟，向自己的同族要求支援了。毛澤東此時若整肅他，就等於公然的和蒙古民族爲敵，自己撕毀「保障蒙古民族當家作主的地位和權利」的諾言。這樣必會引起整個蒙古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反抗。

歐陽無畏先生：

西藏地區反共反毛鬥爭

匪僞統治西藏，自「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成立後，控制加緊。惟藏胞之反抗共抗暴武裝鬥爭，隨時隨地，迄未稍息。去年八月，藏南連布 Dvags-Po 地區，及拉加日 Lha-t Gyat-Ri 兩處青年七千餘人聯合工布 Kong-Po 山區（該區首鎮江達 rGyang-rDah，即清末擬建西康省境之太昭縣，距拉薩一百四十英里，爲西康入藏咽喉要道。）反共游擊隊，作戰五日之久，焚燬匪僞「無宗教委員會」會址。此一行動，迨爲近年來藏胞反共抗暴武裝鬥爭規模最大之一次。同月藏北黑河地區，反共游擊隊攻擊匪幫一貿易公司，焚燬房屋，搬運糧食以歸。

去年十二月間，西藏西部濟隆 Kyid-Rong 地方（該地爲藏邊通往尼泊爾國要隘之一，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海蘭察統率清廷大軍遠討尼國，主力即由此處出境，七戰七勝，直達尼京北郊。）三

至於烏蘭夫說出這句話的背景，我們只有猜測。但是他說出這句話之後的影響，却是不可忽視的。它可能燃燒起內蒙古人反共反毛的野火；但也可因此而影響到外蒙與共匪之間的關係，甚而構成蘇俄的藉口也未可知。最近報紙又刊出在內蒙地區「白色恐怖」極爲普遍的消息，又說柯錫金在倫敦公開說出支持反毛活動之說。其間的蛛絲馬跡，也是研究今日內蒙問題時，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名武裝匪軍，領導當地居民一百七十餘人，集體向尼境逃亡，爲匪軍追襲，抵達尼境成功者僅十四人，餘悉被追捕回濟隆，三名領導份子均戰死。藏胞反共游擊隊，經常出沒西藏與鄰境交界之山隘地處，如西藏西部之「和張」隘口、「迪斯華」隘口，以及青海、新疆、與西藏三交界之一隘口，襲擊駐防各該隘口匪軍，甚而加以佔領，匪軍爲之戒嚴。而其他零星戰鬥，數星期中，匪軍爲康藏反暴軍民同胞殲滅者，累計五千餘名。

如上西藏地區以武裝鬥爭形式的反共抗暴，僅略舉少許經過透露之消息數則爲例，其地區分佈，已遍及西藏全境。康藏同胞爲求繼續佔有使用原有生存空間，與挽救其種族之集體流徙消散甚或滅亡，鬥爭之艱苦，已瀕離日常生活所奢黍粒之微，亦必出死力以爭之絕境。一切社會組織，政治制度，

宗教信仰，文化藝術等等之維護綿延，已不遑計及。通常反共鬥爭之多方面形式：文化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軍事的……以及其他，但在西藏地區則轉向以反共的民族鬥爭為主導。

匪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向匪黨內反對派及社會上敵對勢力發動總攻擊之下，去年十月，西藏十餘萬喇嘛中之百分之九十被迫除籍，強迫勞動。十月十五日周匪恩來對北平藏族學生宣佈：「喇嘛被文化革命解放了！」此為匪偽發動文化革命對西藏傳統文化最嚴重殘暴之一大破壞。其程度較一千一百餘年前，西元九世紀時代藏王朗達瑪Glang-Dar-Ma毀滅佛法，使西藏淪於百年黑暗之歷史慘痛，有過之無不及。

匪偽發動紅衛兵大串聯後，其欲前往西藏串聯之「西北民族學院紅衛兵，今年元月要求進入西藏，被偽西藏自治區第一書記，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匪國華下令禁止進入。張匪命令，對此敢字當頭，其目的在造反奪權之紅衛兵，自不生效，紅衛兵終於進入西藏。然張匪暨其副司令員余致泉拒絕支持革命造反派之行動，復下令禁止進入西藏串聯之紅衛兵散發傳單，張余二匪且公開反抗匪黨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匪軍須支持革命造反派之指示，下令「西藏軍區獨立團」副政委黨武功率領匪軍包圍革命造反派羣衆，並架起機關槍嚴厲鎮壓。張匪終以反毛罪名遭逮捕，祕密押赴北平，所遺職務，由一周姓匪幹代替。據報載：偽組織駐藏代表張經武亦已被捕。又藏族親匪份子西藏自治區主席阿旺晉美，西藏區政治協商委員會副主席三顏澤旺里森，拉薩市長卓哥華邦達已被整肅。西藏區自治委員會駐北平及

上海兩辦事處，亦被毛林集團造反派查封接管。西藏人民廣播電台，新華社拉薩分社亦被接管。除上述西藏首城拉薩而外，其他各地紅衛兵之奪權造反者，有昌都及墨竹工卡（Mai-Grol-dGon-Kha在拉薩東約三十英里，為拉薩盆地之東緣起點，康藏大道必經驛站）兩地之紅衛兵與當地工人發生流血衝突。墨竹工卡扎西鄉（bKra-Snis-gzis-Kha在拉薩盆地中，東距墨竹工卡約十英里）居民百分之六十參加鬥爭。當雄（hDam-Gzung）為拉薩與黑河中間，距拉薩約七十英里）縣內一批畢業實習學生要求參加鬥、批、改運動，惟會遭當地匪黨組織阻止。

洎交本年二月，西藏地區匪偽組織毛林集團份子，以與反毛派鬥爭相持不下，已電北平，請派大軍支援。拉薩反毛派經常武鬥打傷紅衛兵，並圍攻奪權之毛派份子。於混亂中，一羣共匪幹部曾打破玻璃窗，闖入西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辦公室，砸爛桌案，並將該會偽大印印走，此迫造亂至極矣！此一形勢之發展，必將使各邊之反共民族武裝鬥爭愈趨擴大，終使各邊地區，將繼內地腹裏之動亂而特大動亂而循環變態不已，馴至演成各邊地區各族各自成立各個之獨立體系。一旦至此，匪偽內受各邊地民族武裝鬥爭之環攻，外有中華民國反攻大軍之解民於倒懸，其滅亡之時，卜終不久。

在此一形勢之下，西藏地區之反共抗暴鬥爭，應如何促使提早成功。

一、認識正在進行中之康藏同胞反共抗暴鬥爭含有反漢民族之因素。應辨清其所反為漢人中之匪偽。至其民族主義之本質部份，可善意的加以接納。並應以此為基礎，確定今後對藏之一切方針。

二、康藏同胞基於其民族心理之政治願望，多少有程度上之不同。二次大戰期間，大西洋憲章揭櫫「當地居民有選擇其自己政府形式之自由」之原則以來，亞非各國殖民地紛紛獨立，以成莫之能禦之潮流。西藏本為滿清皇朝領土，中華民國依法繼承，原非殖民地之地位，不論任何原因，絕無放棄之理。然需加以適當之考慮，為鼓勵康藏同胞反共抗暴鬥爭之積極性，可給予高度自治權，以鑿足其民族心理。惟一要點為：「自治區域」，事先宣佈此種承諾時，必包括明定其區域界限極至之邊界線在內。

三、西藏政治人物雖然反共，然並非絕無可能傾向俄國人者。十九世紀末，達賴吐丹嘉措兩次差遣其侍讀學士 Mishan-Nid-Zabs-Zu-wa（英人 Charles Bell 誤譯此銜為顧問 Advisor）阿旺朵結 Nag-dBang-rDo-je（此為其哲邦寺僧籍登記之名，Charles Bell 依其俄語化之人名為作 Dorjii）前往聖彼得堡謁見尼古拉斯二世，籲請此東正教教皇援助此大悲觀自在佛化身之喇嘛教主，引起英俄兩大帝國在東方之激烈暗鬥，終至釀成一九〇四年榮赫鵬率領英印軍隊侵入拉薩之役，且間接促成日俄戰爭。今日俄人為反毛鬥爭之故，與美國以及各主要自由國家間以偽和平相週旋，去年塔什干會議，更以其力能協調印巴爭端炫耀於世。今達賴丹增嘉措流亡異國，印度國力荏弱不足恃，美援遠隔，若西藏地區反共抗暴鬥爭演變為純粹的赤裸裸民族鬥爭時，更不考慮其他。一旦俄人起意加以利用，誘以甘餌言：「佛陀教義為西藏所必需，共產主義不適用於西藏」，則達賴可能又復重作其前輩會黨寄希望於北方香婆邏國救主降臨之幻夢矣。為將來利

害計，不令西藏有「人民共和國」之可能出現。爲道義計，國民政府所冊封之「護國宏化普慈圓覺大師」，不必因其未盡「護國」之責任，而聽令流離失所，而成爲赤色陽翟大賈可居之奇貨。發使資冊，迎之來台，居之深山，館以叢寺，禪靜說法。另外妙選藏族富有能力之政治領袖，以達賴名義號召全藏，聯合自由國家各友邦，給予全面實際援助，加強進行西藏地區之反共抗暴鬥爭，如此所有敵敵後全體康藏同胞，獲聞旣樹此精神領導，自必人心大奮，赴義如歸。

四、反共反毛鬥爭，爲反文化大革命之鬥爭。匪僞之文化大革命欲消滅一切固有文化，則反共反毛鬥爭，必須復興一切固有文化。西藏地區之反共反毛鬥爭，亦必須復興西藏之一切文化。凡屬匪僞對文化上之一切罪惡行爲，在反共反毛鬥爭中，必須一一反其道而行之。匪僞焚燬西藏無數喇嘛寺院，在台灣應興建一所喇嘛寺院。匪僞迫害十餘萬喇嘛僧衆，台灣佛教會及寺院應儘量收容逃難來台喇

嘛僧衆。匪僞焚燒西藏之佛教經籍、佛像、法器、繪畫、雕刻、工藝製品……以及一切有關文化成就之實物，台灣文化界應動員各種力量加以搶救、蒐集、典藏、展覽、模製仿造、培養各色各行西藏文化藝品之工藝技匠。動員學術界將西藏原有文化結晶成就，分門別類調查、研究，介紹於世界發揚而光大之。大量接運逃出國外之西藏難胞來台，原業畜牧者，居於高山，業農者，居之氣候適宜之��，使牧使墾，俾養生計。……一切一切，以中國之力量，協助康藏同胞，收復故土，重建家園，爲根本建設中華民族之至計。如此使西藏反共抗暴鬥爭之領導中心達賴來台。台灣有喇嘛寺院，台灣成爲復興西藏文化之基地，台灣之經濟繁榮有康藏同胞供獻之一部份，台灣之地方選舉，居台康藏同胞可得而學習熟練之，將來使藏人有國亦享民主自由之權利與康樂，化今日反漢民族鬥爭，爲異日全民族團結一起絕對不分離之三民主義之福利國家。

師，以林彪爲代表。
(二)由紅二方面軍改編的八路軍一二〇師，以賀龍爲代表。
(三)由紅四方面軍改編的八路軍一二九師，以劉伯承、徐向前爲代表。
(四)由長江下游地區匪游擊部隊改編的新四軍，以陳毅爲代表。
戡亂時期的演變：
(一)先是賀龍系統的西北野戰軍，以後改編爲第一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
(二)先是徐向前系統的中原野戰軍，以後改編爲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
(三)陳毅系統的華東野戰軍，以後改編爲第三野戰軍。
(四)林彪系統的東北民主聯軍，以後改編爲第四野戰軍。

至於聶榮臻的華北野戰軍，以後改編爲中央直轄部隊。
共匪竊據大陸初期，仍然保持上述的面貌，只是駐地有改變，一野在西北，二野在西南，三野在華東，四野在中南，直轄部隊在華北，東北當時爲東北人民政府，其部隊屬林彪系統。
自四十三年匪成立國防部以後，則撤消各野戰軍番號，改由大軍區指揮，以後又重劃十一個一級軍區及三個直轄軍區。這些都是名義上的變化，主要派系仍依舊分爲：

呂達先生：

毛共以軍整軍的末路

一、毛林派在軍中勢力的分析

研究匪軍的派系與實力，似應由其歷史發展探索較有根據，但這也并不是絕對可靠的，因爲人的變化因素，常是難以捉摸的。

我們打從「紅軍時期」談起，當時可分爲三個主要系統：

(一)毛澤東、朱德所屬的紅一方面軍系統，包括林彪的紅一軍團和彭德懷的紅三軍團。

(二)賀龍所屬的紅二方面軍系統。

(三)張國燾徐向前所屬的紅四方面軍系統。

抗戰時期匪軍演變爲：

(一)由紅一方面軍爲主力改編的八路軍一二五

(一)林彪系統。
(二)賀龍系統。
(三)徐向前系統。
(四)陳毅系統。

除了以上四個代表人物以外，匪軍的元老如朱德、彭德懷、劉伯承等，對過去他們領導的部隊仍具有一定的影響的作用。

就以上的情形來看，我們假定林、徐、陳系統的部隊業已合流，毛林集團目前可以控制的實力，概略的估計約在百分之六十強，其餘的部隊不僅談不到完全控制，且若干與毛林站在對立的立場，容在以下的報告中再作進一步的分析。

二、匪軍內部鬥爭與文革

匪稱自竊據大陸建立偽政權以來，匪軍經過三次大門爭，第一次是四十六、七年間，當時因為韓戰結束以後，軍中瀰漫純軍事唯武器思想，認為未來的戰爭是要依靠機械與現代化武器，但當時匪俄關係已開始惡化，俄援業已減少，現代化的條件受到限制，因而在四十七年初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清算純軍事唯武器思想，重新提出「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建軍原則和軍事思想。

關於這個問題的爭執，多少年來在匪軍中還是沒有解決，特別是一些參加過韓戰和接受過蘇俄教育的幹部，陸軍的特種兵和海空軍，他們認為打仗就要靠好的裝備和訓練，只學毛匪思想是不能擊敗敵人的，這種想法恰與林彪提出的「革命化」恢復匪軍傳統發生了嚴重的抵觸。

但是毛林的一些作法也是耐人尋味的，我們都知道毛匪好大喜功，他雖然批評單純軍事觀點，着重打「人民戰爭」，但他却不惜民命發展核子科學，一方面盲目的以躍進方式向尖端發展，另一方面在部隊裏苦練二百米內過硬功夫，雖然經過了幾次核子試爆，但是軍隊的裝備仍然是落後，這種軍事發展脫節和不平衡現象，是經不起戰爭考驗的。

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

第二次大門爭是四十八年廬山會議清算彭黃反黨集團，這次主要是因彭黃等人反人民公社、反大躍進，反對社會主義建設而引起。第三次就是由前年十一月開始到目前的軍中文革鬥爭，這三次的鬥爭雖然性質不同，但匪歸結一句話就是軍中的政治思想問題，所以林彪自四十九年接長國防部長、中央軍委以來，首要的課題就是加強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加強學習毛匪思想，因而就有所謂「把全軍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甚至「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等爛言。

今年開年以來有三件事比較引人注意：第一、元月十二日匪黨改組了軍委文化革命小組，以徐向前任組長，江青任顧問。第二、元月廿三日下午令各地軍隊參加奪權鬥爭。第三、元月廿六日下午令全區民航系統由匪軍接管。從這三項措施來看，所謂「文革」鬥爭已發展至嚴重的階段。毛林集團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原寄望以「紅衛兵」打擊劉鄧之「當權派」，但演變結果不但未能達到此種目的，反激起大陸社會之劇烈動亂，而迫使毛林集團繼動員匪公安特務嚴厲鎮壓後，不得不動用軍隊作生死鬥爭。

依據常理來說，如果毛林能百分之百的掌握匪軍部隊，「文革」應該已經結束，但事實却不然，若干地區的匪軍出現了支持「當權派」打擊「造反派」的情況，這就說明了匪軍內部的問題是相當複雜而嚴重的，毛林以軍整軍的演變將如何，恐怕毛林本身亦不敢設想，自然更沒有絕對的把握。

當前毛林整軍的步驟，一方面要在軍中徹底清除劉、鄧、朱、賀、彭及所有敵對派的影响力。朱、賀、彭都是匪軍的元老，劉、鄧在軍中亦有相當的

淵源，特別是鄧負責黨務工作十數年，軍中許多黨工幹部係由鄧之荐拔，這些人在軍中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所以我們看到匪軍內部整肅開始就是鬥爭各級負責文化宣傳工作的負責人，這主要是為了奪取輿論地盤，毛匪會說，不論是革命派或反革命派，在製造行動的初期，都是先由形成意識形態開始，掌握了輿論就等於控制了羣衆的喉舌。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這些影響力絕非短時可以清除的，從今年開始匪解放軍報歷次供認：「一些單位對這場偉大門爭很不認真」，「軍中仍有部份反毛力量未被鬥倒」，并說：「軍中一小撮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有組織有計劃對革命羣衆圍攻，企圖把革命羣衆打成反革命」。所以軍中的鬥爭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甚至永無間斷。

另一方面是要對那些擁兵自重的地區匪酋解除兵權，特別是西南、西北、內蒙、新疆、西藏等地的匪酋們至今還沒有明白表示他們對毛林的效忠，所以他們就成為北平大字報攻擊的對象，他們也非常明白，即便是表白了他們擁毛，仍然避免不了一場殘酷的鬥爭，所以今天這些地區確實是有問題，并且隨時均可能觸發事件。最近外電會報導周恩來願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問題以避免流血鬥爭，此并非不可能之事，據最近毛林集團所貼的大字報先後透露匪軍中有許多高級將領會參加去年二月由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所策劃的「政變陰謀」事件。二月四日匪解放軍報社論指稱：「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採取陰險、隱蔽、狡猾的手段進行新的反撲，……這些傢伙也企圖糾集人馬搞反革命聯合，……他們還使用孫行者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裏頭與妖怪作怪的手法，打入

革命造反派隊伍內部，惡毒的挑動革命派打「內戰」，妄圖從內部分化瓦解革命隊伍，擾亂革命陣線，破壞革命大聯合，轉移鬥爭的大方向」。因為軍隊和一般機關團體不同，毛林集團生怕軍中出亂子，所以在元月廿七日軍委會議的八項指示中，特別規定軍中的文化革命，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利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批評，主張文鬥，堅決反對武鬥。最近國內外的觀察家們，有的說匪區已經有「內戰」，有的說已是「內戰」邊緣，我們很客觀保留的說，匪區的動亂還要更尖銳的發展下去，毛林集團在亟力避免「內戰」的原則下，已經有了「內戰」的準備。

三、未來的趨勢

共產黨人是沒有道義和情感可言的，今天大家是同志，明天可能就變成敵人，毛匪更是出爾反爾，過去的例子很多，單以此次文化革命來說，初期明明規定軍隊不參加文革，但是到了他無法可施的時候便說「軍隊不介入是假的」，其實早已介入了。毛林集團對於那些不能絕對控制的人都視為敵人，所以過去一批對匪軍建有汗馬功勞赫赫有名的匪徒，目前都已變作毛林的階下囚了。類似這種循環不已的鬥爭整肅早已在匪軍中開始，一些幹部耳傳目染真是觸目驚心，怎不徬徨失措人人自危。

匪軍因為任務複雜（戰鬥隊、政治隊、生產隊），所以對政治特別敏感，本年元旦匪解放軍報社論就提出警告稱：「隨內外情勢變化與文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上尖銳而複雜的階級鬥爭將越來越多的反映到軍隊之中」。

匪軍中過去即有官兵之間，上下之間，黨軍之間，軍民之間以及新舊之間等矛盾，經過這次文化

革命在軍中的激盪，在無間歇的大整肅以後，相信這些矛盾不但不能消除，反而可能更加增長。固然，我們低估敵人的力量將是一項錯誤，但如我們認為匪軍經過這些不斷的整肅可以消除軍中問題，因而對其產生恐懼的心理，那將是一項更大的錯誤。所以我們客觀的認為，匪軍由於派系恩怨戰力必受影響，因之士氣必將低落，盲目的搞政治思想工作，對於軍隊現代化也將蒙受損失，匪區的大動亂，

劉粵生先生：

「文化革命」必將走向敗亡

各位先生：我沒有什麼準備，此外我也說不上什麼研究。聽了剛才各位先生所研究分析的各方面的形勢和所講的各項問題，我自己覺得我更談不到了。各位先生都是專家，認識問題都很深刻，雖然我出來沒有幾個月，但是今天各位先生所談的都增長了我的智識，所以我在這裏沒有什麼特別的報告。不過就我自己的感覺來說一說自己的意見。過去十七年來，整個中國大陸上反共反毛的鬥爭一直未停止過。而今天毛共搞的「文化大革命」是十七年來毛共各種錯誤政策的總失敗。反過來說也是十七年來大陸各階層人民反毛反共的總爆發。所以它的規模很大，聲勢亦猛。我們所講規模大聲勢猛，不僅從毛林這一派的「整肅」對象之深廣而言，反毛反共這一派也是規模大、聲勢猛的。

今天的情況據我個人來看，正如各位先生都已

生產機構的停頓與減產亦將對軍隊之供應發生影響，因此我們說，當前的匪軍應該是從竊據大陸以來，最感徬徨無措，也是戰力最為脆弱的時期。

一九五八年共匪搞「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對農工生產的殘害，至今已十年尚未恢復當年的生產水準。所以我們說，匪軍歷經這次「文革」的殘害，也絕非是短時間內可以復元的。

談到過的，反毛總歸就是反共，這種看法是很有根據的。大陸十七年來共匪的政策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的政策。毛澤東自己承認過去十七年來，或者說三十年來他自己在共黨內是處於少數。當年在延安、井崗山作亂時，大部份都出於他自己個人製訂政策。今天整個大陸包括各民族人民同胞、經濟生活、政治信仰、工業、農業問題以至今天複雜的國際問題；如果要他在井崗山、延安時代成熟的那種所謂「毛澤東思想」來控制這局面的話，當然會出現錯誤越犯越多的現象。我說一句好像不太合適的話：十七年前在延安、井崗山時代，毛澤東對共產黨來說或者他個人正確的看法；但是他主要的錯誤，則從一九四九開始，經「一邊倒」、「三面紅旗」到今天的「文化大革命」，無一不是以個人極權為出發點，也無一不是以失敗告終。甚至可以包括這次「

文化大革命」在內。毛澤東今天要拿當時統治延安井崗山的方法來控制整個大陸，那他的錯誤必繼續犯下去，越犯越大，直至崩潰。剛才張先生也報告毛澤東用一九二四——五湖南的「農民運動」來作爲今天「文化大革命」的藍本。大家想想看：在時間不同，空間不同，歷史趨向，文化的進展情況，及人民思想，國際局勢等各方面都不相同的情形下，要拿三、四十年前的東西回過頭來控制不是延安、井崗山，而是整個中國大陸的局面，這怎能不會錯誤越來越大，失敗越來越大？我們看毛澤東從「一邊倒」到「三面紅旗」，就知他的錯誤是一個接着一個，失敗也一次接着一個。「文化大革命」也將如此。但我們要注意，毛澤東這個人在緊要關頭的時候最擅於退卻。「文化大革命」沒有調和，今天邊疆

問題由周恩來提出「可以談判」，我認爲在毛澤東來說就是一種退卻。照「毛澤東思想」來說：鬥爭是根本無談判妥協餘地的，要就是，要麼不是。毛共提出談判，就是表示讓步。即使文化大革命在毛林佔優勢之下結束勝利，問題並未解決。因爲他要的是求全勝；在求全勝之下，他碰到的困難還要大，因爲求不到全，也就求不到勝。「革命」鬧到要談判，這就不是一個「全」了。所以我自己認爲他興起「文化大革命」來整肅人民不會有什麼正面的結果，這樣做實際使人民更清楚的認識了共產制度並對之進一步表示厭惡而反抗。

毛澤東要採取的一切「妥協」和「退卻」的辦法，只能緩和局面於一時，並不能消除人民與共產主義制度處於生死對立的這一根本矛盾。

胡秋原先生：

中國人民革命運動之加速

因爲我今天來的很遲，許多專家學者的演說可惜沒能聽到。老實說，在我手邊這一類的資料很少，而且除了一份中央日報之外，連其它的報紙都很少看到。所以對此一問題，實在說不上有什麼研究。不過，我是一個中國人，我知道中國歷史和過去許許多多事情，因此知道今日大陸變化背景，也便能將若干消息放在這背景中考慮。且將我的一點淺薄的看法來講一講。

第一：我認爲中國大陸最近所發生的事件，主

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

動者並非毛澤東，而是中國人民。今日大陸變化是中國人民的再革命運動。這是我根本的看法。何以如此？試想，假若毛澤東政權穩定的話，那有今天這些事，誰又敢反對他呢？共產黨有這麼龐大的組織，如能得人民贊助，誰能打倒他呢？今天大陸情形似乎很亂，外國人只看出是共黨內部的鬥爭。其實，一切是中國人民的力量和毛澤東的共產黨政權不能相容的結果。今天大陸上所發生的事件，我可以簡單的一句話表明：「這是中國歷史的發展與共

產主義所發生的必然衝突！」如果這句話太抽象，我可以借用馬克斯的一句話來幫助解釋，也是他最精彩而別人從未說過的一句話，那就是：當生產力發展到與生產關係不相容的時候，就有社會革命。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今天大陸的革命乃是中國人民的生產力量也好，文化力量也好，與共產政權所造成的政治關係、經濟關係必定發生的衝突。總而言之，中國人民自然發展的力量與共產主義的機器的架子，不能相容，自然就要發生今天的一切事情。也就是說，中國人民力量的發展與共產機器發生衝突時，共產黨的機器當然要炸裂。共黨機器炸裂之後，毛澤東要修理這部機器，加強這部機器的控制，於是有所謂「文化大革命」、「紅衛兵」。但愈修理，愈加強控制，愈要炸裂，所以就發生了今天這些事情。一般人所謂「權力鬥爭」者，實際上是中國人民衝破共黨機器的結果而衝破了的中共機器，當然只有融化于人民力量的洪流中。這是我的根本看法。

這衝突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這道理很簡單，即中國根本不需要共義主義。那麼，毛澤東政權何以能成立呢？我們只能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史達林利用整個東半球的權力真空，利用了美國人的無能，建設了蘇俄權力，毛澤東政權是在俄國人的幫助之下，利用中國戰後政治上混亂的情況，偶然地出現的，不是必然的東西。所以毛澤東政權的機器建立後，必定要與中國人民起衝突，一起衝突，他這部機器就要逐漸崩潰。十七年來一切大陸上的事件，都可以作如是觀。今天只是中國人民革命運動之加速。

既然如此，我認爲這次的革命一定要繼續下去

而且加速。其理由：(一)共產主義的機器已被打破，中國共產黨已不能再成爲統一的整體，只有日益分化、分裂。(二)毛澤東的神話破產了，只有在人民心目之中變爲惡魔毒蟲和狗糞。(三)由於交通的混亂、經濟的失敗，到了今年青黃不接之時，大陸必定有更大的革命事件發生。所以我認定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必定會繼續發展下去。由此來看，我爲中華民族的前途慶賀。這是第一點。

其次，我認爲現在不是共產政權結束的問題，而是用什麼方法來結束他的問題。反毛反共固然很好，然如果弄得不好，而使大陸人民相互殘殺，造成大流血，弄成明朝末年那種情況，還是要使漁人得利。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不得不希望能以最少的流血而完成此一革命。

我看今天大陸的革命運動，必定有很優秀的人才在指揮，但決非劉少奇之流。試看今天許多人跑到北平去要求經濟條件，是很有意思的。陳伯達之流竟指這是什麼「經濟主義」，實表示其無知。「經濟主義」是什麼？「經濟主義」派原爲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一個派別，其領袖爲史曲微，認爲俄國落後，俄國工人運動目標應以經濟爲主，乃一種合法的馬克斯主義運動。如今大陸革命運動不提政治口號，只提經濟要求，不是那種「經濟主義」，而是共黨一貫策略。共產黨在所謂革命高潮時拿政權，低潮時一定提經濟要求。這有目標與手段之差別，如何能稱爲「經濟主義」呢？簡單的說，如今大陸革命只是用共黨戰略反毛而已。爲什麼他們不談政治而只提出經濟要求？試想在人民公社之下，那個人不要吃飯呢？這表面上不是革命運動，但實際上是一個大革命運動。尤其是大家跑到車上去，坐霸

王車。這是什麼意思呢？很簡單，就是要把整個運輸系統弄亂。而使毛賊的軍隊難于鎮壓。所以我認爲要求經濟改善就是一種革命運動。這比拿槍來打高明多了。這使我們想起大陸淪陷前的那些青年學生的「反飢餓大遊行」。結果七遊八遊，就把你的政權遊垮。但經濟鬥爭必然轉化爲政治鬥爭，也是不成問題的。

所以，目前大陸的情況，我們不能看做是什麼「經濟主義」，而是一種人民革命運動，一種很聰明的革命運動。拿這一件事來看，我認爲其中有人才、有人物、有智慧。如果今天發動暴動，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毛澤東還有一定兵力。如果大陸上弄成一片大亂，只是幫了毛澤東的忙而已。因爲混亂可能使許多人要求秩序。所以我覺得在如此一個大國家、如此衆多的人口之中革命，最好的革命方法要想到以最少的流血達到最大的結果。我覺得目前這種「坐車」的方式，要求經濟條件的方式，是很好的開始方式。經過這方式團結大多數的人民，逐漸協和軍隊，可以節約流血，來瓦解毛政權，接收毛政權，是最符合於中國人民利益的方式。這是第二點。

第三：還有一點不能把大陸弄得大混亂的道理，因爲大陸太混亂之後，必定要遭受俄國的干涉，這是我們今天必須考慮的大問題。今天俄國人在中蘇邊界的種種活動，不是偶然的。今天靠近中國大陸而最有力量，能干涉中國大陸的，就是俄國。而何況他還可以與日本合作起來？各位知道日俄戰後，雙方有過許多次默契。中華民國成立以來，我中華民族便一直由于日俄合作，而無法發展。如果大陸掀起大的混亂，很可能引起俄國人的干涉。一方面他可以利用少數親俄份子而將力量伸入中國內部

，另一方面他可能用兵而拿掉新疆——這是俄國向來最有興趣的地方。甚至於在黑龍江或內蒙，也會佔領一些據點。近百年來中國外來的問題，大多是來自新疆、蒙古、滿州方面。所以我們一定要防止俄國人的干涉。我們今天要在國際上、外交上各方面來防止此一危險的發生。俄國人既可以與日本人合作，還可以找美國人合作，對付中國人民，再來挑撥日美鬥爭。目前雖有美俄合作之說，但我想美俄之間還在試探階段，尙未形成具體的政策。但美國人很天真，容易上俄國人之當，如果俄國人釣上美國人，各位先生試想，將造成一個什麼樣的形勢？毛政權是一事，中共又是一事，中國人民又是一事。今天已有這種議論：美俄合作，把中國共產黨的核子工場打掉呀；瓜分中國，由俄國人控制黃河以北，美國人控制長江以南呀；中國人口太多，不能讓他統一，造成「黃禍」呀；在這種構想中，也包括讓中華民國政府孤立在台灣，讓台灣成立一個獨立國呀。我相信這些想法是俄國人想出來的，他先教歐洲人唱，再影響美國人和。如果這構想成爲事實，那也是很可怕的。我們一定要向美國及全世界說明，毛澤東是反中國人民的，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以中共代表中國人民，毛澤東代表中共固然錯誤，以毛澤東代表中國人民更爲錯誤。

但是，如果美國或俄國的炸彈投在大陸的話，會發生什麼反應呢？老實說，將是一種對毛澤東有利的反應。而我們立場將極爲困難。爲什麼毛澤東一天到晚還要向俄國人示威？如今內部已弄得百孔千瘡，爲什麼他還要包圍北平的俄國大使館呢？老實說，今天大陸人民的反對俄國是真的，毛澤東乃利用這種反對俄國人的姿勢，來偽裝「民族英雄」。

如此一來，反對他的，都成了俄國人的走狗，這是毛澤東最好滑的策略。我們也可以回想一下，庚子年間西太后爲什麼在國內政權已經動搖的時候，還要打洋人呢？因爲當時全國人民反對洋人，他既打洋人，當然是愛國的，而康有爲梁啟超都變成了外國人的走狗了。於是好叫老百姓「扶清滅洋」，如今毛澤東也在如法泡製，不過他的胆子比拉那小一點，只敢說擁毛反修，不敢說滅俄。老實說俄國人或任何外國人一旦干涉大陸的事，必定增強毛澤東的地位。所以，我們要對世界說明中國人民的和平政策，毛澤東好戰不是中國人態度；要指出毛澤東的偽裝民族主義，俄禍是他引進來的，同時，我們爲了將來中國領土的完整統一，而不只是爲了目前，應該預防和反對任何外國人的干涉。只有中國人民和中華民國政府才能管中國的事。這需要大陸同胞和我們共同努力。這是第三點。

第四：爲了大陸的前途與反攻復國的目標，爲了使大陸革命走上于全民族發展有利的方向，我很冒昧的提出幾個建議：（一）首先要求知，要加強研究工作，加強理論與實際的配合。我認爲我們今天所有研究匪情或大陸的機關，應該集中力量，做更深入的研究。因爲像中國這如此偉大的國家將來一旦動起來，那力量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所以今天要資料集中，人才集中，好好分工合作做切實的研討。（二）由目前到今年九月間，大陸局勢的發展尙難以預料，在聯大開會之時，也許對我們有利，也許一時不利。所以今天我們政府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今年聯大開會以前，找一個適當的時期向國際上鄭重宣佈（雖然以往我們也會這麼說過）：「所有毛澤東政權同外國訂定的任何條約，一概無效。」

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

效。這要對各國致送照會，同時準備一個很好備忘錄，派遣有力代表團對各國表達這個決心，和大陸光復後的內外政策。這有什麼好處？一方面，是阻止媚毛的姑息主義；另一方面，是想到大陸革命情勢繼續發展下去，一個時期必將造成一個無政府局面，自然要引起外國人特別是俄國人的覬覦或干涉。但有中華民國政府替大陸人民說話，就是防止這個危險的力量，所以我們必對大陸的一切事情，取得發言權。（三）同時，我也想到今年元旦蔣總統說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未來大陸上的事情需要協商政治，修改憲法。我認爲這是很重大的表示。許多人當然希望政府立刻反攻。但我認爲如果此刻現在就下攻擊令，不一定就有好處。我們一定要時時準備着，然而選擇和把握最好的時機。知己知彼和政治號召最爲重要。我甚至於想，解決毛澤東，可能根本不用我們動手，而我們的力量，還要用於在外交上和經濟上協助大陸同胞。但是國家一片混亂又怎麼能和平統一而建國呢？當然只有經過一個

王健民先生：

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

第一 所謂「毛澤東思想」

首先，我想談談大陸反共反毛運動造成的原因

半年以來，大陸上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是毛澤

「國民會議」的方式。我想起 孫中山先生逝世前的遺言：「最近主張召開國民會議……」我覺得這句口號今天還有重提的必要。中國將來只有經過國民會議而能重新合起來，和平統一而建國。而這一點也要自即日起與大陸革命力量溝通聲氣。

我所說的可總結是四句話：

（一）目前大陸的變動，是一場革命運動的加速。他必定要發展下去，同時毛林的失敗也是必然的，而這場革命運動正如方才劉先生所說的，十七年前就開始了。並非起於今朝。

（二）這一革命最好是以最少的流血來完成，這可能性非常之大。

（三）必須防止俄國人的干涉。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最大責任。

（四）未來國家的再統一，有賴於國民會議的方式。這要從現在起與大陸同胞聯絡和討論。

總之，我對中國的將來很樂觀！

東自己一手造成的。他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紅衛兵」爲先鋒，以匪軍爲主力 and 後衛，而以前所謂「毛澤東思想」爲精神武裝。所謂「毛澤東思想」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大家看過毛澤東選集和有關的資料，雖然不成東西，總會有些印象。在

我看來，所謂「毛澤東思想」，歸納起來可稱之為「三三論」。第一，在他上山落草期間，也就是北平偽政權成立以前，他的思想是「三件法寶」，即是「黨的領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第一件法寶，是列寧發明的；第二件法寶是史達林教導的；第三件法寶，共匪稱之為毛匪的天才發明，還要向外國推銷，實則這是中國歷史上盜賊的老方法：漢朝的黃巾，唐朝的黃巢，宋朝的宋江和楊么，明朝的張獻忠和李自成，清朝的白蓮教和捻匪，他們都擅長「武裝鬥爭」，何待於毛澤東的「發明！」毛澤東利用國家多難的機會，又得到俄國人的幫助，竊據了大陸，於是自鳴得意，以為這三件法寶都靈驗了。

第二、毛澤東在南面稱孤的時期，也就是偽政權初成立的十年中間，他的思想是「三面紅旗」，即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確是毛澤東豎起來的，搞得大陸上烏煙瘴氣，但是不到一年，經不起人民的反抗，都倒了下來，毛匪自己也跟着垮台。

第三、現在是毛澤東垂死掙扎的時期，他的思想我替他命名為「三條遺囑」，即是「學習毛澤東思想，反對修正主義、培養接班人。」毛澤東老了，要「去見上帝」了，所以立下這三條遺囑。這三期思想：三件法寶、三面紅旗、三條遺囑，就是毛匪的全部思想「三三論。」

毛澤東預備他的三條遺囑，正是造成大陸反共反毛革命運動的原因。

第二 劉少奇的修正主義

做了十年偽「國家元首」的毛澤東，於民國四十八年，隨三面紅旗倒了之後，自己也栽了下來，

只好「退到第二線」，讓劉少奇、鄧小平等「進入第一線。」

接着就是劉匪少奇做偽主席。他本來是毛匪的親信，所謂「毛澤東思想」，正是他在民國三十四年七次大會上所作「修改黨章報告」捧出來的。在劉匪任偽主席的七年期間，我們很難發現他反對老毛。至於鄧小平、彭真之流，似乎也沒有這個胆量。但是鐵的事實是：老毛的三面紅旗倒了，自己幹不下去了，才讓位給老劉。老劉就採取緩和的作法：總路線還總路線，但是不忙着向社會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過渡；大躍進還大躍進，但是事實上已經大躍退了，劉匪要使牠穩定下來；人民公社還人民公社，但是把所有制從大社移到生產小隊來，自留地、手工藝品、自由市場，也都放鬆些。三面紅旗並沒有毀掉，只是不要招搖而已。這不是劉少奇要反毛，而是非如此不可。毛自己幹不下去了，劉又如何能不改變。但是，誰也不能否認：這就是修正主義。所有共產黨徒都不能不跟着劉走，因此大家變成了修正主義。這個修正主義剛好和蘇聯的修正主義走到一條路上去。蘇聯從黑魯曉夫到布里茲涅夫，儘管後者打倒了前者，其反對三面紅旗則一。所以毛匪指布里茲涅夫是「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主義」，甚至於比黑魯曉夫還黑魯曉夫些。

毛澤東十分敵視黑魯曉夫，倒不僅僅爲了撤退了俄援，把毛匪整得不得下台；也不僅僅爲了他反對三面紅旗；最使毛匪傷心的是他鞭史達林的屍。黑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迫使毛匪於民國四十五年九月的匪黨八大大會上，把「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踢出去，這使毛匪很傷心。還有，毛匪受過史達林的恩典，史達林又是毛匪崇拜而模倣的人物，一

且被鞭屍，當然使毛匪有兔死狐悲之感。因此，毛匪痛恨黑魯曉夫主義，更痛恨沒有黑魯曉夫的黑魯曉夫主義。

現在劉少奇等雖然也口口聲聲的「反修」，但事實上他們的修正主義與蘇聯的修正主義會了流，當然使毛匪立刻聯想到：自己將來「會見上帝」後，會不會被劉少奇他們鞭屍？不等將來，自己活着的時候，退到第二線，會不會被整肅？毛匪發現了大事不好，要趕緊造反，要趕緊打倒當權派，要趕緊奪權。

第三 毛澤東組織紅衛兵

毛匪考慮到：造反、打倒當權派、奪權，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劉少奇和整個匪黨之所以走上修正主義之路，他認爲是中國舊文化發生作用，不錯，中國舊文化與毛澤東思想根本不相容。豈止舊文化而已，人類思想都與毛澤東思想不相容，也就是人類文化都與毛澤東思想不相容。因此，毛澤東要反修非從文化上着手不可，所以他發起文化大革命。靠甚麼力量呢？「槍桿子出政權」，毛匪就不能不靠林彪，他是掌握槍桿子的偽國防部長。而且林彪本來是自己的親信，只要毛匪把他從較低的地位一下拉到第二把交椅，他應當感恩圖報。叫誰來發難、打衝鋒呢？靠槍桿子麼？容易釀成內戰；靠無產階級或工農羣衆麼？一來怕一發不可收拾，會造成直接的反毛反共革命，二來怕工農脫離了生產，會妨害自己的搜括；靠知識份子麼？更不行，他們是文化的代表人物，根本看不起毛澤東思想。想來想去，只有靠學生。他們受文化的熏陶不深，他們對毛澤東思想沒有批判的能力，他們只消費，不生產，他們也打不起內戰來。只要讓他們逃學，坐車坐

船不要錢，吃飯不要錢，支持他們打人不取還手，罵人不敢還口，他們是甚麼事都肯幹的。他們人數多，遍於全國，只要把他們鼓動起來，用槍桿子支持他們，他們就聲勢浩大，要造反就造反，要打當權派就打當權派，要奪權就奪權，這真是最理想的工具了。還有一層：毛澤東害怕一旦「會見上帝」之後的鞭屍之患，所以只有讓這些小孩子天天學習「毛澤東思想」，天天唸「毛澤東語錄」，像和尚唸「南無阿彌陀佛」，道士唸「天靈靈、地靈靈」一樣，才可以訓練他們迷信自己，不起異心。只有叫他們造反奪權，成為「接班人」才可以使自己無身後之憂。紅衛兵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第四 紅衛兵內部的矛盾

然而事體還是十分矛盾。毛澤東一聲號召組織紅衛兵，各級匪幹羣起響應，劉少奇、鄧小平等從中央派出工作組下去，擴大紅衛兵組織。接着問題就來了。毛澤東所發動的紅衛兵，不會叫他們造毛匪自己的反；劉少奇和各級匪幹所發動的紅衛兵，也不會叫他們造劉匪們自己的反，然則造誰的反呢？要造當權派的反。但是劉少奇固然是當權派，毛澤東又何嘗不是當權派，這樣一來，就會促成毛澤東的紅衛兵造劉少奇的反；而劉少奇的紅衛兵造毛澤東的反，同時紅衛兵和紅衛兵就鬥起來了。面對這種混亂情形，毛澤東在北平就利用槍桿子做後盾，先把劉少奇和他的親信份子監視起來，迫令認罪，予以清算；同時，對各地紅衛兵的衝突，凡是反對當地黨政機關和幹部的，都作為「革命造反派」；凡是服從當地黨政機關和幹部的，都是「修正主義派」，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說穿了，就是

這麼簡單。

紅衛兵本身完全是工具，他們分不清楚那一種當權派應當反對，那一種當權派不應該反對，這時就有賴於江青的指示，和軍隊的支援：凡是江青指示的，軍隊支援的，就是革命造反派，否則就是修正主義派。這樣一來，大家走向革命造反派，而毛澤東的勢力就擴大起來了。

然而，革命造反派擴大了之後，內部又有了矛盾：譬如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就有三十二個之多，在對當權派實行奪權中，又互相奪權，所以事體依然是一團糟。這就要看「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如何去處理了。

第五 毛澤東的奪權要連根拔起

毛澤東的奪權運動，在理論上，所有當權派，不問他的地位高低，不問他的業務性質，統統要連根拔起。現在紅衛兵已經在中央奪了幾個部，在地方奪了幾個省、市，自然還要繼續奪下去。一切反毛行動似乎都被克服下去了。但是我們仔細觀察，問題決不如此簡單。奪權運動愈擴大、愈深入，抵抗力將愈廣泛、愈堅強，因為牠會和人民的革命的力量相接觸。例如毛派要工、礦工人抓生產，不能不靠原有的工礦單位的大小匪幹監督，而這些大小匪幹也就是要打倒的當權派，他們假使敢於監督，將立刻被工人紅衛兵打倒。這些大小匪幹，縱不反抗毛派，也斷無惹起紅衛兵打倒自己之理。又如毛派要農民抓春耕，不能不算人民公社社長以至生產隊長這些大小匪幹監督，這些大小匪幹也是當權派，他們不能也不願監督，正和工礦部門的匪幹一樣。其他的任何部門，莫不如此。所有這些大大小小

小、種種色色的當權派，是劉少奇他們的根，也是毛澤東自己的根，毛澤東靠他們生存，却又要把他們拔掉，這真是「毛澤東思想」中的奇想！毛匪也許以為他可以利用紅衛兵做「接班人」，但是共產黨的根有幾千萬條，少則生了幾年，多則生了幾十年，綜錯複雜，不是一下子可以接班的。所以毛匪表面上處於優勢，而問題他將無法解決。

第六 人民的反共反毛

人民的態度怎樣呢？在初期奪權鬥爭中大致上採坐山觀虎鬥的態度。過去的幾次暴政行動，大都是共匪整人民：土改是整農民，五反是整工商業者，鎮反、肅反是整一切反共人士，思想改造、大鳴大放是整智識份子。黨內整肅雖然也不斷進行，但規模不大，從無如此次之連根拔起者。此次毛澤東要把當權派連根拔起，所有大小匪幹人心惶惶，這在人民看起來，都是活該！他們平日作威作福，殺人整人，此次如能統統被整，豈非大快人心！回想共匪初期幾次大暴行，殺人兩千萬，勞改四千萬，正是當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指揮之下的「傑作」。於今羅匪自己也戴着高帽子遊行，掛着大牌子受公審，大陸人民豈有不拍案叫「絕」之理？假使所有幾千萬的匪幹也是殺的殺，勞改的勞改，豈不大快人心。人民當然也知道：毛匪也並不是好東西，他只是以毒攻毒，並不是「海瑞罵皇帝」，而且毛毒比劉毒還厲害。不過人民此時還是觀望的成份多，消極的行動似乎還少。人民這種態度是很自然的，也是很聰明的，自己站在第二線，讓他們混戰一場再說。人民現在消極反共反毛，大致是採下列的手段

：第一，跟着紅衛兵起鬧；也成立「赤衛隊」之類，從事鬥爭、串聯、請願等活動。第二，脫離工作崗位，停止生產，反正人民的財產沒有了，損失的是共產黨的財產。第三，擁護「經濟主義」，人民公社的積穀，工礦企業的增加工資、福利金之類，爭取來，用了再說。

消極反抗事實上已經發生很大的戰果：日本到大陸各港口的船隻的卸貨率，降低了百分之八十，由此可見一斑。專以紅衛兵而論，到北平受毛澤東「接見」的達一千萬人之多，他們來自大陸各地，又回到各地，又到處串聯，擾攘已達半年之久。他們坐車、吃飯、零星開支，在在需錢。假設僅以這一千萬人計算，每人開支了偽幣二百元，即需二十億元。紅衛兵革命沒收財產的勝利成果，根據貴所發的參考資料，包括黃金、美鈔、英鎊、人民幣等等，經過我約略計算，合偽幣也不過二億五千萬元，僅及這一千萬紅衛兵開支八分之一。如果把工、農各方面生產之破壞、停頓、經濟主義之開支等等合計起來，將是無法估計的大數字。

第七 匪俄關係

匪俄的關係會怎樣呢？我看毛澤東非逼成匪俄絕交不可。因為如前所述，蘇俄的修正主義和匪黨的修正主義，七年來已經走上了一條路上去。「蘇修」與「匪修」的關係不切斷，則匪修變成了有根之木，有源之水，縱使一時被整倒，也會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何況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等明目張胆的說，要支持匪黨打倒毛澤東。所以毛澤東認為必須和蘇修完全決裂，始可以挖去匪修之根。——一天不絕交，蘇聯駐匪區大使館將一天不得安寧。

匪俄會不會打仗呢？照毛澤東的判斷：不致如此，否則他決不敢如此反蘇。事實上蘇俄也沒有下決心打大陸。毛匪一直一面反美，一面反蘇，都是建立在美蘇都不會進攻大陸的假設上。這個假設，直到目前為止，似乎獲得證實，至於未來的變化，就很難說了。

說到這裏，我要談談我們中華民國對俄的態度問題。

我們有一個口號叫做「反共抗俄。」我們之所以要抗俄，因為俄國幫助匪竊據了我們的大陸，承認了偽政權，在聯合國作排我牽匪的活動，以及與匪訂立了軍事同盟條約，表面上對付日本，暗地裏含有抵制我軍事反攻的作用等等。因此，我們非抗俄不可。如今匪俄交惡，情勢有很大的轉變。他們已經瀕臨絕交的邊緣，俄國對牽匪入聯合國也不熱心，他們軍事同盟條約也變成了廢紙，一旦我們反攻大陸，蘇俄絕對不會幫助匪軍。在大陸淪陷以前，雖然俄國常常侵凌我國，而我政府始終抱一種容忍的態度，因為中俄緊鄰，邊境相接一萬多里，這兩個國家如果交惡，將同受其害。這是兩國人民所應當重視的問題。

第八 我們的接應

最後，我願意談談我們對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的接應問題。

大陸上毛派與反毛派鬥爭的發展，可能發生五種情況：

一、匪幫的兩敗俱傷——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看情形決不會中止，因為中止了就是修正主義的勝利，自己的失敗，自己如不活着被整肅，也會死

後被鞭屍，這是自命為神的毛匪所決不能忍受的。如果毛匪的連根拔計劃獲得成功，則匪幫統治立刻將形成一種脫節和虛弱現象，如果不成功，也是兩敗俱傷，一遇外力打擊，將土崩瓦解。

二、人民直接行動——人民目前的革命運動還停留在消極階段，將來匪幫內部鬥爭的發展，必然殃及人民。例如：已經分了的農村積穀，已經收了的增加工資、福利金之類，總有一天被共匪追查、清算、迫害。又如人民參加過紅衛兵、赤衛隊之類，其中是非，自己也洗不乾淨。尤其是現在全國性的怠工、怠耕，其所種下的惡因，不出半年，大陸上將出現大匱乏、大饑餓的景象，人民沒有飯吃，決無不造反之理。

三、匪軍的介入——目前匪軍已經開始介入奪權鬥爭之中，將來事態愈深愈大，愈演愈惡，匪軍被捲入漩渦，極有發生內戰可能。

四、匪俄關係的決裂——匪俄關係，只要毛匪活着一天，得勢一天，他斷不能容忍「俄修」幫助「匪修」，勢非釀成決裂不止。匪俄由文鬥變成武鬥，並不是不可能。

五、美匪衝突——越戰的和平解決，希望很小，越南的戰火燃燒到大陸，不是不可能的事。假使越南戰爭由於俄國的斡旋而和平解決，則美俄合作以對付共匪，也不是海外奇談。

以上五種情況，只要有一種發生，我們就可以武裝反攻大陸。在這些情況發生之前，我們也應利用大陸上紊亂情勢，作更大的政治反攻，作更強的軍事準備，以促成並把握有利的機運，配合大陸上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完成反攻復國的大業。以上是我的淺薄的意見，敬請各位指教。

萬大鈺先生：

毛澤東衆叛親離

各位先生：

很抱歉，我手邊的資料不夠，所以對於大陸目前的混亂情勢，只能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來請教各位。

首先，從批判吳晗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和罷免彭真，這是出於毛澤東有計劃的陰謀。至於紅衛兵的出現，和目前的造反奪權，則好像是在打爛仗，打到那裏算那裏。但可以看出這一點，這次毛澤東是在劣勢作戰。剛才胡先生講目前整個大陸中國人民都是反毛反共，這是很對的。請看毛澤東的老幹部一個一個離開他了。毛澤東有三個心腹人。第一高崗，第二劉少奇，第三是林彪。高崗已死，劉少奇又垮掉，林彪的得寵誰知能維持多久？爲什麼一個個「親密戰友」都反毛呢？因爲人民都反對共產黨，反對毛澤東路線。毛澤東在劣勢下作戰，他的一貫戰術是打遊擊戰。作戰要用部隊，但他所面對的敵人是自己的幹部，不能一下子拿出槍桿來，因此這次文化大革命竟用紅衛兵作打手，這是想不到的。紅衛兵出現以前，他搞了二年貧農下中農協會。各位看一看這個會的組織條例，就可知道它是代替了農村中的黨和青年團。因爲那時候毛澤東已感到黨和團不是他的了，所以要另起爐灶。但貧農下中農協會組織起來之後，好像不發生作用，所以這次又搞紅衛兵。可見紅衛兵的出現是毛澤東衆叛親離的結果，除

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

了不懂事的小孩子，所有的成年人，稍爲有理智的人都離開了他。毛澤東誘騙小孩子參加紅衛兵的法寶有兩種：一種是高中畢業生不必經過考試，可以進入大學；還有一種是串連。也就是可以免費到北平去玩。紅衛兵就仗這兩個法寶組織起來的。現在匪黨裏面反對毛澤東的人不知有多少，所以毛澤東自知這個仗打起來毫無把握。因爲沒有把握，所以他用了一個不負責任的戰術，就是以大字報爲武器來對付他的敵人。何以說大字報是不負責任的攻擊呢？因爲大字報不具名，有的雖然具名也都是些不三不四的紅衛兵組織，所以用大字報作武器，情況不

對，可以推卸責任說不是他講的，情勢對了，就把這人打倒，這是一種滑頭的打法，也可見這一仗毛澤東毫無把握。

現在奪權的情況，依據我的看法，反毛的人很多，毛是在以寡擊衆，所以他的第一個戰略是破壞敵人的團結。最近，毛林派竭力鼓吹革命派大聯合，這有兩個目的，一面是要團結自己的力量，一面就是要破壞反對派的團結。因爲到目前爲止，反對毛澤東的人雖多，但是沒有聯合的機會；同時也還不敢公然提出反對毛澤東的口號。目前的情勢還是混亂的，毛澤東的勝敗關鍵是在能否在反毛派未曾大聯合之前，將敵人各個擊破？那麼反毛派何時才能促成他們的大聯合呢？將來這個機會也許會有，就是在奪權鬥爭中，多出動幾次軍隊，多流幾次血，那時反毛派被逼得非團結起來，和毛林派拚個你死我活不可。到了反毛派由無組織變成有組織的時候，也就是爲毛澤東敲喪鐘的時候。

呂律先生：

匪俄邊界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最近匪俄之間因共匪的「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造反，引起一連串磨擦事件，雙方的關係愈來愈壞，形勢愈演愈惡，同時匪俄邊境上的軍情亦愈來愈緊。當前我們要研究的是這種形勢的發展究竟如何？匪俄之間會不會斷絕外交關係？匪俄的邊境上會不會由冷戰演變爲熱戰？

數年前在緬甸投奔美國大使館請求政治庇護的

蘇俄外交官員加茲納耶夫在他所著的「蘇俄大使館內幕」一書中說，蘇俄各階層有一種普遍的感覺，認爲匪俄之間或早或晚要發生一場衝突，而共匪的經濟和軍事發展得愈快，這種衝突愈成爲不可避免。一般又感到西伯利亞的人口過少，將成爲共匪侵略的第一個潛在目標，因此俄人相信，黑魯曉夫

堅決要開發西伯利亞，力主將蘇俄的工業重心移到

蘇俄的東部，主要就是爲了對抗共匪的野心。

中(共)俄邊界概況

中(共)俄的邊界，長達六千五百英里，從太平洋的海參崴到阿富汗的興都庫什山，表面上祇有僞蒙是惟一的一個阻隔，其實蒙俄一體，等於沒有阻隔。

這條六千五百英哩的邊界，起自遠東的大彼得灣，沿黑龍江、烏蘇里江及其支流而上，往西，是潮濕的西伯利亞大森林和乾燥的亞細亞大草原；向南，是中蒙邊境上的大戈壁沙漠；再向西，便是新疆，這裏的邊界是崇山峻嶺，將中亞細亞原先聚族而居的一些少數民族，人爲的中分爲二，以致留下以後無窮的糾紛。去年，共匪「外長」陳匪毅，指控蘇俄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五年中間挑撥邊境事件五千次，而蘇俄反擊說，一九六二年中共匪就侵犯蘇邊境達五千次之多，中(共)俄邊界問題之嚴重情況，已由此可見一斑。

匪俄邊界糾紛溯源

任何兩個相鄰的國家，都不可避免在漫長的歲月中不發生任何邊界上的事件，但是邊界糾紛發生的次數之多和嚴重程度之深遠，當以匪俄之間最近幾年爲最。

起因是黑魯曉夫太缺乏一個領袖人物的容人之量。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當共匪因黑魯曉夫在古巴事件上表示讓步，諷刺蘇俄爲懦弱時，黑魯曉夫對最高蘇維埃報告時說，北平那麼好戰，並且要急於看到美蘇之間實力的較量，可是對於它自己門

口的事却視若無睹，甚至於像香港和澳門那樣的西方殖民地，它也容許存在於國境之內。當時共匪對於黑某此一諷刺未予理會，等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美共也引用黑某這幾句話時，匪「人民日報」乃反唇相擊，並且對於亞洲整個領土現狀提出有力的基本反對。「人民日報」說：「既然有人提到香港和澳門，我們就不能不把我們遭受侵略的故事重述一遍。」這篇文章指出：「在中國成爲殖民地的一世紀中，如以西方強權——尤其是沙皇時代的俄國——通過一連串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實施掠奪而言，香港和澳門的佔領便算不得什麼大事。」在匪「人民日報」的攻擊中，包括有一八五八年的瑣瑣條約及一八六〇年的北京條約割讓給俄國的五十餘萬平方英哩的土地。

匪俄關於邊界問題糾紛的演進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塔斯社曾作過這樣的報導：「由一九六〇年開始，中共的軍隊和平民即已有計劃的從事侵略蘇俄的邊境。光是在一九六二年那一年內，中共方面侵犯蘇俄邊境的事件，已超過五千宗。」

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一日及廿二日，「真理報」及「消息報」分兩天刊載蘇俄政府的長篇聲明，指共匪所加予蘇俄的邊境上的壓力，并不下於所加予印度的。又說，共匪曾提出修改沙皇時代的舊條約問題。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匪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談稱：「大約在一百年之前，貝加爾湖以東的地區變成了蘇俄的領土，其後，海參崴、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勘查加等地區，即成爲蘇俄的領

土。對於這些地區，我們還未提出算賬呢。」

毛澤東於一九六四年八月公開發表一項聲明：「蘇俄現擁有二千二百萬平方公里的一個地區，而其人口不過二億二千萬。現在差不多到了終止這種分配的時候了。」毛匪此種算術邏輯，在莫斯科看起來，實在跟希特勒的「生活空間」的理論同一口氣，所以「真理報」的評論說：「毛澤東所作的關於『領土不公平分配』的聲明，并不十分新穎，別人早已唱過此種論調。」

同年九月十五日，黑魯曉夫在莫斯科接見日本國會代表團時，他提醒他們說：「若謂俄國沙皇是擴張主義者，則中國的帝皇又何嘗不是，他們會奪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

半個月以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賽福鼎駁斥黑魯曉夫說：「假如黑魯曉夫修正主義份子竟然胆敢伸出他們的魔手佔我們的領土，他們將定然被擊退……他們的魔手將要被殘忍的砍斷，一如會侵犯中國的印度反動份子的遭遇。」

當時共匪的理論刊物「紅旗」指控黑魯曉夫策劃邊境紛爭，甚且指揮新疆境內顛覆性的活動，支持印度反動派從事武裝進攻「中國」，更予以軍事上的援助，鼓勵他們繼續對「中國」武裝挑釁。

蘇共的「真理報」則說，「毛澤東所發表關於領土問題的聲明，乃明顯表示出中共領袖們的反蘇冷戰已進至如何強烈的程度。他不獨要索這一塊或那一塊蘇俄的領土，而且描述他的要求爲『一般的領土問題』之一部。我們面對着一項具有連大口頭的公然擴張主義的計劃。」

匪俄邊界糾紛中的幾個特點

匪俄邊界糾紛之地區有三：(一)遠東和西伯利亞，(二)偽蒙，(三)新疆。

匪俄雙方在上述三個地區對於領土爭執所加予對方的壓力，具有一種定型，即共匪通常是在東部黑龍江一帶製造糾紛，而蘇俄則在西部邊境新疆地區對匪施以壓力。

黑龍江北岸的蘇俄守軍曾在共匪方面一個漁民身上搜到一份匪地方機關的文件，指黑龍江中一個小島，不是共匪侵略蘇俄，而是因為蘇俄侵略中國。

去年初，共匪頒佈法令，控制邊境河流上(按主要指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外國船隻的航運，此項法令的新規定可以合法的扣留蘇俄船隻，於是發生了有關領水的爭執。

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兩岸戒備森嚴，莫斯科說共匪曾向北岸射擊。

中亞細亞蘇俄的廣播電台公開向新疆維吾爾族宣傳，說新疆是俄國的土地，遲早將屬於俄國。并且蘇俄的宣傳鼓動新疆的維吾爾和哈薩克族反對共匪，要他們與蘇俄境內的同族人合而為一。同時，蘇俄驅使大量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移居於新疆邊境以北，對共匪構成一種威脅，糾紛事件層出不窮。

最近匪俄邊境上的情況

由於雙方的漫罵日甚一日，磨擦事件源源而來，以至大批軍隊接連不斷開到邊界上。

從帕米爾高原到圖門江口，連亙四千哩的邊境，雙方都駐有重兵。

據月餘以前的報導，俄軍在此地區已有三九個

大陸反共反毛的革命運動

師，四〇萬人，有五個裝甲師由東德調到西伯利亞東部(即東西伯利亞)，在隣近東北與新疆的俄境，空降師在增加中，其中若干紅軍具有最新式的裝備，並配置有射程一、五〇〇哩的中程彈道飛彈。共匪在沿邊境地區駐有六五個師，且在陸續增強中。

最近莫斯科方面會舉行一次邊防會議，據莫斯科電台的報導，該會議召開時，邊防部隊的代表們均有參加。雖則莫斯科電台沒有說明這個會議所討論的邊防問題，但據最近的報導所示，斷定所討論的課題就是蘇俄與中國大陸的邊境問題。

同時，已有消息報導說，蘇俄外交部和駐北平的蘇俄大使館已分別通知駐在莫斯科和北平的亞洲國家外交代表，共匪的「紅衛兵」已在西面的新疆邊境和東面的黑龍江邊境策動平民舉行羣衆反蘇示威集會，要求蘇俄歸還「中國的失地」。

另有消息報導說，在過去八個月中間，約有人數二百萬的中國人移到黑龍江的邊境，料想共匪的動機是在於恐嚇黑龍江對岸的蘇俄人。

共匪「外長」陳匪毅指控蘇俄自歐洲方面調十三個師增防東方，陳兵於匪俄邊境，莫斯科并未反擊或否認。

據法國巴黎震旦報記者到遠東考察的報告說：

沿途有許多蘇俄軍隊及裝甲部隊集中在共匪邊界上；西伯利亞各民用及軍用機場上，許多巨型運輸機均在待命狀態中；西伯利亞一帶無關重要的飛機場均裝有超音速機的起落設備；外蒙庫倫機場現已大加擴充；海參崴機場之跑道旁新建許多停機庫，儲藏許多隊米格廿一型機。

另外的消息來源說，共匪炮擊通過黑龍江和烏

蘇里江的蘇俄船隻；共匪的突擊部隊最近曾佔領黑龍江上二個小島，經蘇俄軍隊開炮擊退；共匪在新疆邊境上分成若干小股向蘇俄中亞細亞地區滲透。

除雙方邊境上一些軍事動態外，另一些情況，亦具甚高的參考價值：蘇俄紅軍官兵凡截獲到共匪間諜者，均受模範軍人的褒獎，蘇俄軍方「紅星報」告誡亞洲俄軍，在各不同單位中儘量減少通話，因為敵人可以竊聽；四年以前蘇俄與共匪之班機猶如穿梭飛翔在亞洲之天空上，現在莫斯科至北平之間的班機已減至每週祇有一次；新疆與蘇俄的邊境事實上業已關閉，蘇俄海關扣留所有來自共匪方面的物品；一九五五年俄人所建穿越偽蒙的鐵路，連接庫倫至集寧的一段業已中斷，共匪已將該鐵路匪區境內之路軌拆除；新疆與蘇俄接壤的某些敏感地點，自去年底已開始備戰，許多專門軍訓班均在進行訓練。

匪俄會因邊界問題發生戰爭嗎？

據報導，蘇俄及東歐許多國家都在公開談論中俄邊界爆發衝突的可能性。

莫斯科深恐共匪不經宣戰而在整個邊界上從事百年的游擊戰爭。此項恐懼心理以致迫使蘇俄調動部隊開到邊境上，并且不惜巨資沿邊境建立碉堡。

儘管在數年以來共匪一再宣稱它對東北以北和新疆的西北方地區有合法的宗主權，莫斯科認為共匪這種說法無異是想把歷史倒轉一百年的愚蠢；儘管最近匪俄雙方的邊境衝突事件時有所聞；但是，到目前為止無任何跡象顯示匪俄之間有發生戰爭的可能。

蘇俄或許因為希特勒突襲的痛創記憶猶深，把它的邊境問題看得過份嚴重，其實，共匪內部的困難很可能使毛匪無法對外冒險。

現在從海參崴到新疆（包括偽蒙在內），匪俄六千五百英哩長的邊境上雖然有比過去駐有數目更多的部隊，雙方對峙的形勢已到劍拔弩張的程度，但是此種態勢是不是表示它們要真正發生戰爭呢？儘管有許多危言聳聽的報導，但是最可靠的判斷，雙方都在儘量避免導致引發戰爭的偶發事件。

假如匪俄一旦發生邊界戰爭，主動是那一方？

目前匪俄邊境上劍拔弩張的情勢，雖然從許許多多報導中可以看出，蘇俄有太多的緊張，以致有太多的近於害怕的小題大作，但是一旦邊境戰爭發生，其主動者必然是共匪，而非蘇俄，蘇俄將竭力加以避免。既然蘇俄擁有核子武器、飛彈和原子彈，為何反怕共匪而不敢接受它可能發動的軍事挑戰呢？

第一、據蘇俄所知，將來共匪要發動的匪俄之戰，將局限於烏拉爾山東隅地區，這些地區適宜的戰鬥方式，主要是舊式戰爭，這是對共匪比較有利的。

第二、共匪深知，蘇俄不敢動用核子武器，此外，據說陳匪毅在最近一次談話中曾警告蘇俄，如果蘇俄對共匪動用核子武器，則共匪將以同樣武器（？）反擊。

第三、蘇俄的軍事和政治策略家都深切明瞭，如果共匪利用傳統的戰法，則它在遠東的據點將會大受損失，共匪可輕易切斷西伯利亞大鐵路以及其他由海參崴、伯力地區通往蘇俄各地的陸上聯絡線。

第四、共匪以帝俄蘇俄用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的方法手段掠奪中國土地的理由，公然提出迫使蘇俄交還包括西伯利亞的大部份，中亞細亞和外蒙古，將使蘇俄非常棘手。

第五、如果匪俄戰爭真發生，蘇俄必首先吃虧，因尚未來得及還擊，而世界各國必紛起調停，阻止戰爭的擴延，使蘇俄陷於挨打的狀態。

對於匪俄邊界糾紛的正確看法

美國匪俄問題專家史華特茲 Harry Schwartz 說：「中俄共之邊境糾紛和北平與莫斯科間爭執的主要問題相較，是一個微小的問題，即使因邊界問題竟然發生武裝衝突，其真正原因亦不在邊界問題本身。」所以，現在共匪與蘇俄之間發生的邊界事件，不過是它們之間的一些基本問題未獲協議之前的一個枝節現象被渲染擴大而已。

我們祇注意一點，就可以使這個問題得到澄清：

毛匪對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提出蘇俄應將帝俄時代用不平等條約的方式掠奪中國的土地還給共匪，他提出這個問題的時間值得注意，這個時候正是黑魯曉夫積極推動共產黨國際代表會議的時候，這個

會議開起來，不論是否將共匪開除，總是使毛匪失掉面子的一舉。毛匪這項談話使莫斯科感到狼狽的，倒不是他所要求交還的失土，而是帝俄時代和蘇俄時代用帝國主義的方式和不平等條約的手段得自東歐各國的土地，問心有愧。毛匪主張凡是用帝國主義的方式取得的土地皆無合法佔領的權利，這一點很可能引起波蘭、捷克、羅馬尼亞等國的興趣，這樣就給黑魯曉夫緊鑼密鼓的共黨國際會議一記悶棍。

一位外國專家說：「中共想收復蘇俄的侵略土地，并無希望，但中共仍利用邊境糾紛對蘇俄施行心理上的壓力。」

邊界問題，給共匪用來壓迫蘇俄可以頭頭是道，譬如，它會利用邊界問題排斥蘇俄參加第一屆「亞非會議」，說它不是亞洲國家，它的亞洲部份是用不平等條約掠奪中國的。

而且共匪可以把邊界問題用到蘇俄以外的用途上，譬如，它對西方國家，可以藉邊界糾紛加深它民族主義的色彩，使西方對它發生幻想，發生錯覺；利用邊境問題的民族主義外衣轉移大陸同胞對匪偽政權的仇恨心理，把大陸同胞對內的注意力轉到對外；利用邊界問題醜化蘇俄，強調蘇俄帝國主義的色彩，藉以爭取新舊有色人種國家。

此外，我個人還有一項不成熟的看法，假如當年和現在，以及今後不論什麼時候，克里姆林宮的主人，不是所謂「現代修正主義」集團，而是史達林或史達林的餘孽，毛匪不會對蘇俄提什麼邊界問題。

主席結論

各位先生：現在距離我們預定散會的時間只有七分半鐘，很抱歉還有好幾位先生限於時間不能提出口頭上的報告。請沒有發言的先生提出書面資料，以便在問題與研究月刊上發表。

今天謝謝各位先生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本人祇想補充兩點，就教各位。

首先，我們知道毛匪最近設立由江青出面的新機構，命令匪軍直接參與鬭爭，同時製造反俄高潮，並宣佈自三月一日起各中學恢復上課等，這是證明紅衛兵的「造反」已失去控制，毛匪深恐紅衛兵的箭頭將對準他本身，故趕緊恢復中學上課，想約束紅衛兵的活動。同時藉對外反俄，想轉移人民反共反毛的視線，但骨子裏却是拿槍桿來鎮壓。毛匪最初原圖以所謂羣衆運動的紅衛兵，來撲滅反共反毛勢力，那知道毛匪的黨政領導機構是被摧毀了，社會基礎是被動搖了，各級幹部的信心也被連根拔除了，可是反共反毛之勢，却如野火燎原，愈來愈大，不可收拾。現在毛匪被迫動用匪軍，但匪軍內部也是人人自危，朱德、賀龍都被整，誰還肯替毛匪賣命？毛匪這一最後措施，但不能挽救危亡，且將引起內部的武裝鬭爭，給反共革命製造了新機會。

其次，關於邊疆各地區的鬭爭，已漸形成對毛匪「中央」的包圍之勢。新疆是共匪核武器發展的根據地，西藏和內蒙則不僅居戰略上的重要地位，而且早已燃起反共反暴的烽火，也是中國大陸通往外國的門戶。一般人祇注意到邊疆地區匪軍政頭目的反毛動向，殊不知所有派駐邊疆的匪軍官兵和邊疆同胞，無一不是怨聲載道，也無一不是反毛反共的鬭士。他們現在正團結起來，攜手合作，單憑毛匪、江青、林彪三個搖搖欲墮的匪首，又如何能控制這一廣大遙遠的邊疆？

至於談到匪俄關係的問題，一般人推測雙方將斷絕外交關係或甚至訴諸戰爭一點，目前可能性不大。但是匪俄彼此間的鬭爭，事實上已至白熱化的階段。蘇俄現在的目的，是想推翻毛匪澤東的個人統治，恢復對中國大陸的控制，因此故示陳兵邊境，伺機檢取便宜。但是我們中國大陸的反共反毛鬭爭，是我們中華民族自救救人的革命運動，在政治上蘇俄沒有任何藉口可以干預。為了避免世界大戰，我們也不能容許任何外國勢力來干涉。

最後關於毛匪所遭遇的經濟危機，由於紅衛兵之亂，對工農生產交通大肆破壞，其嚴重的後果，必將在今後幾個月中更為惡化。目前大陸春耕已無人願意下田，幹部不敢推動，工礦企業多數停產或減產，可以預料春夏之交，將因經濟困境出現更大的動亂。

各位先生，在大陸所發生的反共反毛革命，十七年來其實是一直未停，今天不過是共匪整個錯誤的暴露，所以聲勢兇猛。因為這一鬭爭，主動來自中國人民，是中國歷史文化與共匪暴政統治不能相容的必然衝突，所以一定繼續發展。我們今天的問題，不是共匪倒不倒的問題。一定必倒，而是我們應該如何來使這一鬭爭能與我們國家民族的利益相結合，與整個亞洲和世界和平自由的目標相結合。